

分类号 _____
U D 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10741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减税降费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

研究生姓名: 肖振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将俊生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应用经济学 财政学

研究方向: 税收理论与政策

提交日期: 2021年5月30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肖振 签字日期：2021年5月30日

导师签名：蒋收生 签字日期：2021年5月31日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 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 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 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肖振 签字日期：2021年5月30日

导师签名：蒋收生 签字日期：2021年5月31日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ax and Fee Reduction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Candidate : Xiao Zhen

Supervisor: Jiang JunSheng

摘要

近几年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的减税降费政策,从结构性减税、营改增、再到大规模减税降费,而且减税降费规模也逐渐增大,这有效减轻了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的消费负担,刺激了社会经济活力。当前,国际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环境也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而且,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面对这种现状,需要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和协调经济发展,所以,减税降费政策的有效实施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平稳运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主要选取减税降费实施后 2008—2019 年全国各地区的税收和相关经济变化数据,分别从全国层面以及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层面研究减税降费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通过对税收增速、宏观税负以及收费增速变化的分析,得出减税降费政策对减少税费收入和降低宏观税负的效果显著性。然后,分析规模以上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投入量、第二、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变化,得出减税降费对投资与消费的增加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的显著性。通过以上的理论研究,目的是描述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的经济现状。再次选取增值税税负率、企业所得税税负率、个人所得税税负率、非税收入费负率作为解释变量指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GDP 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面板模型,分别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进行实证研究,目的是描述减税降费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显著程度。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税种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差异。基于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结论,本文给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第一,继续完善税制设计,持续释放减税降费红利;第二,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制定差异化的税收政策;第三,减税降费与财政收支要提质增效,保障政策的持续性;第四、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培养地方水源,缓解财政收入压力。

关键词: 减税降费 经济发展 东中西地区

Abstract

Recent years,a chain of tax and fee cut polic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China,which from structural tax cut,VAT instead of business tax to large-scale tax and fee abatement policies,with much larger extent of these policies cover.All these policies have effectively alleviated the production costs of enterprises and the consumer,which simultaneously spur the vitality of the society.Currently,recovery of the whole economy is feeble,with erratic factors and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t home.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which mentioned above,is significant to the smooth,healthy economy operation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bove depicts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fter the tax and fee cut.Then through the empirical study to examine how remarkable the real GDP is impacted by the rate of VAT burden,business income tax,Individual income tax,non-tax revenue from the level of the eastern,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respectively conclude that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ax types on the economy of different region vary.Based on the result above,there are the suggestions:First,improve the design of the tax system further to release the dividend of the cut of tax and fee.Second,formulate diverse tax policies,which aimed at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Third,enhanc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ax and fee cut and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to ensure the policies operate continuously.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above,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data, which related to economy and tax variation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x and fee cuts from 2008 to 2019, and then examine the alleviation impacts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level of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First, by the changes in the rate of tax and fee growth, the macro tax burden, evaluate whether the cut have strikingly lightened tax revenue and macro tax burden. Then, analyze the input of R&D in enterprises above scale, the proportion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GDP, the variation of soci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to examine the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is significance of the abatement influencing investment, consump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 words: The tax and fee cut;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region of east, central and west in China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意义.....	2
1.2.1 理论意义.....	2
1.2.2 现实意义.....	2
1.3 文献综述.....	3
1.3.1 国外文献.....	3
1.3.2 国内文献.....	4
1.3.3 文献评述.....	7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7
1.4.1 研究主要内容.....	7
1.4.2 研究方法.....	8
1.5 创新点与不足.....	9
1.5.1 创新点.....	9
1.5.2 不足之处.....	9
2 减税降费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10
2.1 相关概念.....	10
2.1.1 减税降费.....	10
2.1.2 区域经济.....	10
2.2 减税降费理论基础.....	11
2.2.1 古典经济学派减税理论.....	11
2.2.2 凯恩斯学派减税理论.....	12
2.2.3 供给学派减税理论.....	13
2.2.4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13
3 我国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原因和内容	15
3.1 我国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原因.....	15

3.1.1 国内原因.....	15
3.1.2 国际原因.....	16
3.2 我国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内容.....	17
3.2.1 第一阶段的结构性的减税.....	17
3.2.2 第二阶段的营改增减税.....	17
3.2.3 第三阶段的更大规模、普惠性减税.....	18
4 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分析.....	19
4.1 税收收入增速放缓.....	19
4.2 整体宏观税负水平下降.....	22
4.3 具体税种的减税成效.....	25
4.3.1 增值税税负水平显著降低.....	26
4.3.2 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下降趋势不明显.....	27
4.3.3 个人所得税税负水平下降趋势逐渐显现.....	29
4.4 降费成效较好.....	30
4.5 企业研发经费投入量保持高水平增长.....	33
4.6 产业结构优化状况较好.....	34
4.7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保持高水平增长.....	36
4.8 小结.....	38
5 减税降费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39
5.1 实证模型建立说明.....	39
5.1.1 研究假设.....	39
5.1.2 指标的选取.....	40
5.1.3 数据来源说明.....	40
5.1.4 模型的设立.....	41
5.2 减税降费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5.2.1 描述性统计.....	41
5.2.3 平稳性检验.....	42
5.2.4 豪斯曼检验.....	42
5.2.5 实证结果分析.....	43

5.3 减税降费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43
5.3.1 描述性统计.....	43
5.3.2 平稳性检验.....	44
5.3.3 豪斯曼检验.....	45
5.3.4 实证结果分析.....	45
5.4 减税降费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46
5.4.1 描述性统计.....	46
5.4.2 平稳性检验.....	46
5.4.3 豪斯曼检验.....	47
5.4.4 实证结果分析.....	47
5.5 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实证结果对比分析.....	48
5.6 小结.....	50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6.1 研究结论.....	51
6.2 政策建议.....	52
6.2.1 继续完善税制设计，促进减税降费红利持续释放.....	52
6.2.2 针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实施差异化的税收政策.....	54
6.2.3 减税降费与财政收支要提质增效，保障政策的持续性.....	54
6.2.4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培养地方税源，缓解财政收入压力.....	55
参考文献.....	57
后记.....	62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在 2008 年金融危爆发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受阻，有全面下行的大趋势。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我国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于是当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其与扩张性的财政支出相配合，目的是刺激需求，恢复市场活力，促进我国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当时的财政政策对中国化解经济危机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后我国经济恢复到高速增长水平。

但是，2012 年我国经济增速出现显著性下降，造成经济下行的因素就是经济结构失衡，以需求为导向的财政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力不断减弱，甚至出现抑制市场经济活动的趋势。所以，为了缓解经济下行压力，2015 年中国开始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解决供给侧的矛盾，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此后的减税降费就成为“降成本”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工作的重心。

2016 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政府主张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以便于减轻企业负担。由此我国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减税和普遍性降费，当年便实现减税 5736 亿元，减税降费效果显著。自 2016 年以后，我国的减税降费政策由结构性减税转向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并举后，连年出台了减税降费措施，减税规模更是逐年增大，尤其是在最近三年，“减税降费”一直是财政年度热词。

2018 年，普惠性更强、力度更大的减税降费在我国拉开帷幕，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设定了 1.1 万亿的减税目标，为了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和实体经济增长，政府在此期间又相继实施了一系列减税措施，全年的减税降费规模比预订的 1.1 万亿元减税目标超出 2 万多亿元，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负担。随后政府又继续推进大规模减税进程，2019 年，两会会议上“减税降费”被多次提到，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实施规模更大的减税降费，所以 2019 年减税效果更加显著，减税金额达到 2.36 万亿元。2020 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严重抑制了经济增长，为了扶持企业有效应对疫情，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阶段性和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其中，据国家税务局网站显示。虽然 2020 年经济下行压力更大，但减税降费力度不减，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 2.5 万亿元，有效减轻了企业

负担。2021年两会提出我国经济增长预计达到6%，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随着政策推进，税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未来减税降费的红利值得期待。

减税降费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本文试图研究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在我国不同区域间的经济效应，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因此，减税降费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经济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减税降费的实施，会减轻企业的税负压力，生产成本随之下降，同等生产条件下其营业利润就会增加，企业的可利用资金更加充裕，减税能够提高经济市场主体的投资积极性，企业的资金流就会得到充分调动，其产出能力一定出现显著性提高，这又会激励企业增加投资规模，进一步提高产出，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经济水平一定得到提高。短期内，减税降费虽然会缩减政府财政收入，给财政支出带来压力，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总量会逐步增加，这有利于扩大税源，税源的扩大将带来税收收入大幅度提升的局面，这就是放“税”养“余”的税收思想。

1.2.2 现实意义

我国市场规模巨大，有较强的供给能力和旺盛需求潜力，而减税降费可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增加可支配收入，进而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和产品供给，内需与供给的提升有助于形成国内大循环。减税降费即能吸引外资进入国内，又能促进我国的贸易出口，我国的企业在国际竞争和合作中会更有优势，这有利于促进国际循环，所以减税降费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具有现实意义。

特别是在2020年疫情全球暴发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很多企业暂停生产经营，举步维艰，减税降费有利于企业缓解疫情冲击的影响。现在我国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国内经济环境依然存在着不稳定性，所以，继续实施减税降费对稳固我国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区域间经济水平不均衡,减税降费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给予了特别的优惠措施,这有利于减轻当地的税负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符合我国的发展理念。

1.3 文献综述

1.3.1 国外文献

(1) 减税降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外学者对于减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很早,多数研究表明:降低税率、减少税收收入,有利于经济效益提高。

whalley(1975)运用 CGE 模型研究英国税收政策改革发现:所得税税率降低可以有效增进社会福利,而停征消费税、开证增值税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效应不显著,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相反的效果。Piggot Whalley(1985)选取多个国家的税收经济数据,经过实证研究发现,降低税负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Keith Marsden(1999)深入的研究了税收变化与 GDP 增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税收收入每降低 1%,GDP 增速将上升 0.36%。R.Alison Felix (2007)认为经济高水平国家的企业所得税收入总额每降低 10%,员工收入将提高 7%。Adkisson 和 Mohammed(2014),选取美国各个州之间的面板数据,分析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证明个税和销售税收入降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James Ike Ugwu (2018)通过选取 1999-2015 年间的经济数据,研究了尼日利亚、加纳和南非 3 个国家的税收优惠对吸引外资流入的贡献和促进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降低企业所得税,出台税收优惠能有效吸引外资,当外资流入达到显著水平时,对出口的影响就越显著,这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增长。

但也有少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是:减税对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微弱。

Soledad Artiz Prillaman,Kenneth J. Meier. (2014)利用 1997—2005 年美国 50 个州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州营业税对该州整体经济状况的影响,文章发现:通过一套复杂的控制机制,州营业税削减对州生产总值、增加就业机会、个人收入、贫困率和企业机构机会没有正向的影响。Thomas L. Hungerford(2018)选取 1946—2016 年的企业说得税税收数据,研究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与提高经

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经分析结果显示：无法证明较高的企业税率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所以作者认为美国的《减税和就业法案》中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不太可能刺激经济增长。

（2）减税降费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个区域经内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当地财政政策的支持，国外学者对于税收优惠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通过研究，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Robert S. Chirinko, Daniel J. Wilson (2008) 以美国的减税政策与投资的关系为研究主题，选取 20 年的数据，最后结果显示，减税回引起地区之间的竞争，只有当一个州实施减税政策是，其投资率会上升，所以减税政策大打折扣。Tammy Leonard; Xi Yang; Lei Zhang; Connor Reed (2020) 研究了美国实施减免财产税政策的对促进社区就业和社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选取了 43 个城市的 45 各行业为样本，研究结果发现：财产税减免与就业增长正相关，有利于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

1.3.2 国内文献

（1）减税降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国内文献，关于我国减税降费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许多学者经过理论分析或者实证研究，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总的来说，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是减税对经济增长有利。

安体富，王海勇（2004）研究证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能够优化经济结构。谢安忆（2008）研究发现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消费增长、投资增长、出口总量增长呈负相关，所以作者建议降低名义税率，刺激经济增长。司规（2010）为研究 2008 年我国实施结构性减税以后我国经济变化状况，选取多种指标数据，研究发现结构性减税促进了投资设备增长，刺激了消费需求，出口压力得到缓解，有效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孙彦彦，韩仁月（2012）选取 1996—2011 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实证回归模型，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后，主体税种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研究发现：流转税对经济增长效果显著，其税

收占比每增加 1%，GDP 增长率将提高 0.059%。进一步分析流转内部情况，发现把营业税税基转变成增值税税基，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冯彦杰，娄峰（2018）运用一般均衡模型，经过分析认为增值税税率下降不仅可以提高我国 GDP 水平，而且能够缓解通货膨胀，促进出口、提高社会福利。蒲火元，曹宗平（2018）构建 DSGE 模型，经模拟研究结果显示降低生产部门的劳动或者资本税率，能够有效促进产出水平，拉动投资消费水平。李明，李德刚，冯强（2018）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税率若调低 1 个百分点，那么企业的产出增加值的增速将 3 个百分点，故减税降费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利。李戎，张凯强，吕冰洋（2018）选取国内县级数据，分析税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实际税率若下降一个百分点，将分别带来 0.24 和 0.45 个百分点。刘磊，张永强（2019）研究主体是增值税减税对我国经济和居民生活的影响，研究数据是增值税收入，GDP 以及消费投资，分析方法是构建 CGE 模型，结果显示：增值税减税可促进 GDP 增加，对促进居民的收入、消费和企业的投资、进出口意义重大。曹玲玲，印言（2019）选取规模以上企业为研究对象，探析减税与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相关性关系，研究数据是 2000-2018 季度数据，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设立 VAR 模型实证分析，最后结果是减税降费与 GDP 增长关系显著但是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不显著。姚维保，申晨，李淑一（2020）通过梳理中国 2018 年以来颁布的减税降费政策，并基于广东省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发现，超过八成的企业表示减税降费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带来了积极影响。李雪松，刘明（2020）通过构建中国 CGE 模型，来模拟分析 6 种不同情形下增值税税率的降低对经济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增值税税率的降低，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进而促进消费和拉动投资，促进产出增长。李晓乐（2020）以日本法人税减税与产出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数据选者范围是 2007—2015 年日本的面板数据，由实证研究结果得知，实际法人税率降低与经济增长成正比，而且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显著，但是，对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不利影响。胡海生，王克强，刘红梅（2021）运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测算了我国 2018 年以来增值税税率的降低和增值税加计抵减这两种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增值税税率的降低减轻了大多数行业的税负，改善了税收扭曲，提高了各行业的增加值。加计抵减政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税负的降

低有效,但对经济产出增长有略微抑制作用。从动态来看,增值税税率降低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会越来越强,而增值税加计抵减的作用越来越弱。汪川,姚秋歌(2021)研究主体是直接税和间接税各自的减税成效,其运用 DSGE 实证模型,实证结果证明了减税可以刺激投资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其中,间接税减税政策在短期内对经济的拉动效果显著,直接税则是在长期内效果更显著。张佐敏,马艺文(2021)通过构建 CGE 模型研究结构性减税的普惠性,结果发现结构性减税只对部分行业有效,不具有普惠性。其中,增值税税率下降能够促进第二产业发展,对第一、第三产业发展效果较差,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能够促进大多数行业的发展,但对以公共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效果较差,个税扣除额提高有利于第一和第二产业发展。

(2) 减税降费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由于区域之间经济状况不同,其减税政策实施效果也是不尽相同。

张伦俊(2006)对我国的东中西部区域为研究对象,探析税收政策对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显示,降低各个税种的税负水平能显著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史桂芬(2007)税制设计不合理会加重部分地区的红宏观税负,所以作者认为应该合理设计税制,减少区域经济差异。胡广运(2009)以我国东中西部为研究对象,以税收负担和税收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主要分析内容,选取的范围是 1998—2007 年全国各地区的的面板数据,通过研究得知:税收负担的降低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有差异,但是对各地区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作用。同样,税制结构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也是各有不同,但总体来说直接税比例增加有利于经发展。刘学亮(2016)研究了结构性减税对广西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结构性减税创造了公平的税收环境,减轻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其中 2012 年增值税起征点的提高减税 2.5 亿元,并且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能够引导创业和增加就业。梁俊娇,李羨於,刘亚敏(2017)三位学者,把全国分为 5 个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以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作为研究内容,数据选取 1994—2014 年,经实证分析显示,降低税负可以促进中西部经济增长。闫怡芳(2019)以呼和浩特市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是探析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效果,最后结论是全市减税规模巨大,税负明显下降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

其中，第三产业成为了全市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2019）以江西省为例，研究了减税降费在江西省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增值税减税规模占总减税规模的 40%以上，80%的企业感觉到企业税费负担的减轻，税费负担减轻的企业有一半进一步扩大了投资力度。宋永华，薛宇择（2021）通过 DSGE 模型对我国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进行模拟分析减税降费政策在这两种地区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对不同地区实行差异化减税政策，比实施总体减税效果更好。

1.3.3 文献评述

从宏观角度来讲，国外学者都是针对一个国家或若干国家的财税政策进行研究分析，从研究结果来看，多数学者认为税率的降低和税收负担的减轻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作用，只有一小部分减税降费政策在实施后得不到理想的经济效果。对于国内的研究学者来说，大部分都基于全国省级层面实证研究减税降费的经济效应。少数学者是针对某一地区的探讨减税政策在当地的实施效果，探析减税在当地实施产生的经济效应，但是关于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对我国东、中、西区域的经济发展影响，几乎没有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分析，首先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差异较大，减税降费的实施促进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效应显著，这许多学者已经证明，但是从 2008 年结构性减税到今年 2020 年的大规模减税降费，这 11 年的减税效果在不同区域之间是否有差异，还学要继续探讨，所以本文计划从区域间角度，研究减税降费对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影响。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1.4.1 研究主要内容

第 1 章：绪论，本章主要阐述了论文主题的研究背景，研究价值与意义，再通过分析国内外学者对减税降费的研究成果，探寻论文选题的意义。

第 2 章：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本章对减税降费的和区域经济的概念给与了准确界定，仔细梳理了各个学派的减税理论，通过减税降费概念界定和减税理论依据能够了解到减税降费的意义，以及为何减税能带来经济的增长。

第3章：制定减税降费政策的原因和内容，本章主要介绍了由于国内外何种原因促使我国开始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减税降费的改革经历的过程以及政策内容。

第4章：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带来的效果，从税收收入增速变化情况、税负水平降低情况、具体税种的减负情况、降费变化情况、产业结构调整情况、企业研发投入经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来分析减税降费的经济效应显著程度，通过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间对比分析，探析减税降费在区域间的经济效应差异，并分析其原因。

第5章：减税降费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本章主要是通过运用 stata 软件，通过构建的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非税收入的税负降低对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显著。并且是通过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分别进行实证研究，找出其中异同，并给出解释。

第6章：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通过前几章的系统分析之后，总结其问题的原因，并给出针对性的建议，为我国的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提供参考意见。

1.4.2 研究方法

(1) 归纳法

针对减税降费这一领域通过阅读大量的相关文献和书籍著作，充分利用本校的图书馆和数据库，专题搜索相关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归纳出减税降费的相关概念、理论基础、经济数据等。

(2) 比较分析法

对国内外就该论题这主要研究成果、现状及最新进展、研究动态精进比较全面的、深入的、系统得综合分析，对这一领域研究做到充分了解，对比分析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勇于探索新的内容，不断创新，阐述新的观点。

(3) 统计分析法

本文还查阅了大量的税收和财政领域的的数据，同时结合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减税降费的实际情况，对数据进行合理的科学分析，用数据来支撑本文研究的问题。使用 stata 统计软件分析在相关数据库中归纳整理的的数据，主要用于描述性分析、模型检验、和回归结果分析，验证模型之间相关变量的关

系及作用大小。

1.5 创新点与不足

1.5.1 创新点

本文主要选取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与减税降费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面板实证模型,研究在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非税收入与 GDP 比值的变化能否显著促进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 GDP 增长,从区域角度对比分析减税降费实施效果。

1.5.2 不足之处

在降费效果分析中由于缺乏部分年份数据,所以社保基金收入只能选取部分年份数据数据。在实证模型中,选取非税收入作为降费的指标,这个指标包含了行政事业性收费,但是不包含社保基金收费,所以数据选取不能完全包含降费的内容,这是因为基于各个省份的数据不能完全得到,部分省份数据缺失,所以只能选用一个较为笼统的指标。

2 减税降费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减税降费

“税”通常指的是税收、税赋，是一国政府为了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行以及向人民群众提供公共产品服务，通过法律程序，向企业和个人强制获取税收收入的一种手段。

“减税”是指在税法规则范围内，通过调整税制要素，减少纳税个人或纳税企业的应纳税额。减税一般是通过简并税种类或税挡、提高纳税起征点、降低税率、扩大抵扣范围等途径，减少税收量，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扶持、鼓励特定企业或行业的发展。我国的减税政策有：1、结构性减税，特点是有增税也有减税，目的是扶持特定的行业发展，但总体来说减轻了企业税负。2、营改增，简单来说就是营业税并入增值税，增值税征收范围扩大，目的是减少重复征税。3、大规模减税降费，减税力度大、覆盖范围广，所以更具有普惠性。

“费”通常指收费，指的是政府职能部门、事业单位、或被授予权力的组织，向单位或者个人服务时收取的费用。与税收收入相比，收费也是我国汲取财政收入的方式之一，我国当前的收费项目主要是非税收入、社保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降费”含义是降低企业或个人的缴费金额，主要通过降低费率、缴费比例、以及调整缴费基数等方式来实现降低企业和居民费用成本的目的。我国现阶段的减税降费政策中关于的“降费”主要是降低收费标准可减少企业经营成本、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有利于企业扩大生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2.1.2 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简单的来说就是在不同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资源分配、政策实施等原因，在不同区域之间会形成不同的经济水平。区域经济有不同划分标准，从国家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内可以划分东部、

西部、南部、北部等不同的区域，一般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划分一国不同区域。从国际角度看：有像欧盟、东盟、非盟等区域团体组织，一般是根据地理位置、经济水平、政治文化不同划分不同国际区域。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技术创新、常住人口、财税政策、等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规划不同的发展策略，可突出本区域的经济优势，增加区域经济运行效率。

2.2 减税降费理论基础

2.2.1 古典经济学派减税理论

古典经济学派税收理论产生于 17 世纪中叶，但此时最为流行的是重商主义学派，随着重商主义在 18 世纪中下叶的衰弱，19 世纪初古典经济学派便强势崛起。尤其是亚当斯密代表作《国富论》的出版，其摆脱了重商主义的束缚，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体系成立的重要标志。亚当斯密主张经济自由放任，认为政府尽量少干预经济或者不干预经济，这与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干预经济的观念截然不同。亚当斯密对于税收的观点被概括为税收四项原则，分别是“公平、确定、便利、经济”。

公平的税收原则：第一，亚当斯密主张每个人应该按照各自收入的比例平等纳税，反对以身份贵贱、财富多寡制定不平等的税收标准。第二，斯密认为税收来源于地租、利润、工资，为了公平，应该把税收负担分担到这三种税收上，不能让其中一种承担全部税负。

确定的税收原则：斯密认为对于纳税日期、税率、额度因该是明确的，不得随意变更。其内涵是要让纳税人明白纳税并依法纳税；征税人依法征税；建立税收法律制度。

便利的税收原则：第一，为了避免纳税人感到困难，在纳税人真正得到收入时候，才对其征税，第二，制定税收的方法，应该做到程序简洁、执行便利，让纳税人无困难复杂之感。

经济的税收原则：亚当斯认为纳税人缴纳的税费尽可能与政府收到税费相等，其内涵是对于征税注重效率，降低征税成本。

在减税方面，亚当斯密的思想内涵是：对于土地所有者而言，因为土地地租是不用亲自获得劳动就能得到的，又因为土地税不宜转嫁，所以对地租征税表较合适，他主张地租税应该变动征收，如果地租情况恶化就应该减少税收，不宜设定固定地租税，否则就违反了公平和经济原则。对于利润税不宜定得过高，利润是资本家的投资经营所得到的回报，是用来抵抗经营风险和再投资，如果对利润税太高，资本所有者就会转嫁税负或者转移资本，这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对于工资税不宜课征，他认为工资税的实际承担者是雇主，若对工资课税，雇主的税负增加，就会提高商品价格，转移税负。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学者，大卫·李嘉图，其财税理论也是继承亚当斯密的税收思想，他也主张政府应该对地租征税，不宜对利润和工资征税。李嘉图认为政府收取的税应该是在新增加的资本和收入中，对原有资本不课税，这样能避免生产萎缩。若是最终由资本承担的税，政府尽量不征收，否则资本会因此减少，劳动的需求也会跟着减弱，就业岗位数量下降，工人就会失业。所以他主张对地租征税，地租税不能转嫁，必然落在地主身上，这样就能资本，有利于资本的生产发展。

通过以上可以发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对资本要减少征税，这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2.2.2 凯恩斯学派减税理论

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凯恩斯学派由此兴起，该学派认为，有效需求的不足是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单靠市场机制的调节已经无法实现最初的均衡，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与参与，通过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干预经济，实施减税降费。减税降费的提出是基于需求管理和乘数理论，本质就是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进而通过影响消费与投资需求，再对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产生影响，以实现总供求平衡。经典的凯恩斯理论认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对市场供给，产出及就业产生不利影响，这也是造成经济失衡和失业的根本所在。减税降费的实施，通过降低商品成本进而影响产品价格，增加消费者可支配收入，推动有效需求的增加，而且，对低收入者来说，由于其自身的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在减税降费的过程中的收入效应更大，其消费支出也会随之

增加。同时减税降费通过一系列的投资税收抵免、所得税优惠等措施，降低投资的机会成本，有效激励投资增加。减税降费通过对投资和需求两方面的刺激，进而增加社会总需求，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产出。

2.2.3 供给学派减税理论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面临“滞涨”的困局，传统的凯恩斯学派的有效需求理论已无用武之地。西方社会各界也在不断的努力探索新的理论与政策以解释当时经济面临的困境，并对传统凯恩斯理论提出了一些批评，与此同时，供给学派应用而生。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阿瑟·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其基本意义即：税率与税收收入呈现一种倒U型的关系，起初税率的提高会增加税收收入，当税率升高到某一临界点后，若继续提高税率，税收收入就会降低。由于税率处于一个极高的水平，生产者利润大幅缩水，严重抑制其积极性，社会经济活动低迷，税收收入减少。与凯恩斯学派不同，供给学派侧重于从供给角度分析经济问题，其理论依据就是减税刺激经济增长。

供给学派认为，通过税率变化影响要素的相对价格，以劳动力和资本供给为例，税率的降低会增加劳动者的税后收入，闲暇的机会成本增加，因而会更多的选择劳动，从而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当税率降低时，储蓄的机会成本增加，人们会更多的选择消费和投资，从而促进社会投资的增加。同时该理论还认为，高税率会严重伤害社会投资、消费及劳动供给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生产的发展，进而导致供给不足，物价上涨的结果，若只是一味的人为刺激需求将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进而使得生产、需求和劳动力供给进一步萎缩，恶化经济状况。

2.2.4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国家内各区域的经济是成比例的增长，而且各个地区是既相互牵制，又相互帮扶的向前发展。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很多，他们的主要观点可以分为2种，其一，产业结构均衡发展，从产业角度主张一国或地区的产业均衡发展，认为一国政府应该对国内主要产业各部门的进行大规模持续性的投资，这样各个产业就能相互促进，形成规模经济，进而突破发展的瓶颈，促进本国的经济大发展，这尤其适合发展中国家，不过这

主要适合工业化刚刚起步阶段。其二，空间区域的均衡发展理论，这从地理角度出发，认为不同区域之间会趋于均衡发展，属于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发展理论，其理论基础是在一个国家内，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下能够相互配合，最终实现各区域均衡增长。此理论的缺陷是忽略了区域间的差异性，现实经济中几乎不能实现。比如我国东中西部资本、人才、技术等差异太大，经济要素在各区域不肯能实现自由流动。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演化出新的区域经济理论。

区域经济非均衡理论：当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遇到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时，并不能明确说明为何区域间经济水平差异太大，所以，区域非均衡理论就随之产生并得到一定的关注。其理论认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不平衡是必然的过程，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若要实现经济高效增长，就要把资源投向产出效率较高的地区或部门，这样就会使得部分地区富裕，部分地区贫困。可以利用经济富裕区域带动落后地区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也是采用了非均衡理论，这就出现了东高西低的经济状况，所以，可以利用积极财政政策，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3 我国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原因和内容

3.1 我国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原因

3.1.1 国内原因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完成，离不开减税降费的政策支持。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是提高供给效率，优化经济结构，进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产品有需求方就有供给方，供给方主要就是企业，所以企业经济利润的提高有利于改善供给质量和效率，而减税是激励企业生产发展的有效方法。

“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了企业负担，提高了政府财税服务质量，改善了营商环境，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改善，有利于供给侧改革任务完成和稳定经济增长。

(2) 经济发展理念发生转变，更加注重经济质量。

经过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性提高，社会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变，故我国人民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观念也不再是一味追求经济速度，而是注重环境保护，积极引导企业技术创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意味着我国政府以后既注重经济高质量增长，又注重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我国对企业的要求不再是大规模扩大生产，提高企业利润，而是鼓励企业调整生产结构、降低耗能，朝着绿色、高效、创新方向发展，所以我国实施新的税收政策，刺激企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战胜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2020年初，我国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全国绝大部分企业的生产活动遭到抑制，餐饮、旅游、酒店住宿、交通通行也被限制，这严重冲击了国内的经济，服务业受损严重，小微企业面临破产的边缘。此时，政府需要出手救助，而税收优惠政策是良好的应对工具。所以，在疫情期间，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是头等大事。故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减税政策，帮助企业化解疫情冲击。但是疫情期间给予的税收优惠政策是短暂的，若想让企业持续恢复生产，提高营业利润，还需要政府进一步制定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现在，新冠病毒并没有从

全球消除，企业进出口依然受限，所以，为促进企业发展，减税降费政策应该继续推进。

3.1.2 国际原因

(1) 全球经济增长缓慢，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复苏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比较缓慢，2020年又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下滑3.5%，在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实现了经济正增长2.3%。2021年3月9日，经合组织预测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会提高到5.6%，而经济的复苏离不开各国积极财政的支持，而且，我国的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又伴随着多重风险，因此需要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风险防控，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运行。所以，我国的减税政策从2008起就不断更新完善，减税力度也越来越大，直接刺激了社会经济活力。全球经济虽然增长缓慢，但也是在经济逐渐复苏的条件下，我国的民间投资自2016年后开始复苏，在减税降费红利持续释放条件下，全社会宏观税负下降，我国企业生产环境不断改善。

(2) 世界各个国家的减税政策相继出台，引发国际间的税收竞争

从全球角度观察，美国实施的大规模减税法案，其目的吸引投资回流、增加就业岗位，刺激经济增长，在一些欧洲国家如英、法、德等也在计划或正在实施减税政策，其他国家也在陆陆续续加入全球减税浪潮，英国计划把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15%以下，法国计划将特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5.3个百分点，而德国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刺激消费需求。这些国家减税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本国企业减轻了负担，提高了国际竞争能力，激励了投资者的信心。

在全球的减税氛围下，我国因该审时度势、顺应时势，制定适合国情的减税政策。减税降费可以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增加企业利润，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如此一来，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就业岗位增加，个人消费能力增强，还能吸引外资流入，增加财政收入，进而刺激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3) 经济全球趋势受阻，中美贸易争端不断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投入到全球化浪潮中，深度参与国际经济交流，所以在过去40年里我国的经济水平大幅提升。然而全球化是把双刃剑，有机遇也有挑战，每个国家国情不同，在产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的利益不尽相同，而且，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缓慢，部分国家受到战乱、瘟疫、恐怖主义、失业、贫富差距扩大等因素影响，加剧了逆全球化的思潮。尤其是 2020 年的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对各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贸易保护主义趁乱而起，一些国家不但不愿意推进国际合作，反而推出国际组织制造贸易摩擦，大搞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强逆全球化趋势。

在我国面对逆全球化思潮过程中，又受到了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影响。2018 年，美国对进口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为了反击，也对进口美国产品加征关税，这场贸易战持拉锯状态，对两国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不利影响。所以中国在面对这样的国际局势，首先是要稳住国内经济，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经济政策，应对外部经济压力，所以，应继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加速财税体制改革，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稳定国内经济应对贸易争端和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冲击。

3.2 我国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内容

3.2.1 第一阶段的结构性的减税

2008 年，为了缓解我国遭受的经济冲击，“结构性减税”被首次提出。所谓结构性，即在于减税涉及的范围有所侧重，是针对特定行业、特定企业的税负调整。此时的减税内容主要是：第一、扩大投资方面。实现内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增值税由“生产型”全面转为“消费型”，以鼓励企业增加技术投入和积极创新；对于小规模纳税人给与一定照顾，对其增值税增收率适当降低，以减轻小企业的经营负担；单边征收印花税并下调其税率，以提高资本市场效率。第二、调整经济结构方面。给予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集成电路、软件等相关行业给予税收优惠，提高高科技含量产品出口退税率，希望以此种方式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转变出口方式。第三、改善民生方面。优化个税扣除标准，扩大较低档税率适用范围，对下岗失业人员及困难群体再就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以提高其收入水平。

3.2.2 第二阶段的营改增减税

2012 年元月 1 日，营改增试点工作正式在我国铺展开来，首先地点就是上

海市，试点行业是交通运输以及部分现代服务业，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营改增逐步向其他地区扩展。直到 2016 年 5 月份，国内全面实施营改增措施，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建筑、金融和生活服务等领域。

3.2.3 第三阶段的更大规模、普惠性减税

从 2018 年开始，在减税降费方面，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最主要的就是深化增值税改革，包括下调增值税税率、重新调整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一次性退还部分行业的期末留抵税额，以提高纳税人带实际感受得到的减税获得感。2019 年，增值税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再次降低部分行业的税率、扣除率，调整部分出口退税率，改变不动产抵扣方式和部分行业的加计扣除，降低纳税人税负水平和负担。小微企业的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应纳税所得额进一步上调至 100 万元，加大对企业的研发费用税前扣除，以提高企业科技投入和创新积极性。同时个税的重大变化更体现出了此次改革的普惠性，提高工资薪金的基本费用扣除标准，优化税率结构、增加专项扣除，而且此次个税改革是迈向综合征收的第一步，释放出更强的普惠性信号。

4 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分析

4.1 税收收入增速放缓

首先，从全国层面分析，减税政策实施后税收收入与 GDP 变化情况，其数据计算结果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 全国 GDP 增速及税收收入增速变化情况^①

时间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名义 GDP 增 速 (%)	18.66	8.31	18.45	18.4	10.38	10.1	8.53	7.04	8.35	11.47	10.49	7.79	2.99
税收 增速 (%)	18.88	9.75	23	22.58	12.12	9.86	7.82	4.82	4.35	10.75	8.33	1.02	-2.33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图 4.1 全国名义 GDP 增速和税收增速折线图

从图 4.1、表 4.1 可以看出，税收收入增速与名义 GDP 增速的变化趋势相同，2008—2012 年，税收增速一直保持在 GDP 增速之上，说明此段时间内的减税政策力度较小，税收增速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但是 2012 年后，明显可以看出，税收收入增速一直低于 GDP 增速，虽然在 2017 年税收增速出现上升，但是一年之后，又开始下降，因为 2018 年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增值税率减化简并，GDP 增速和税收收入持续走低，而且 2013 年起，税收增速就一直低于名义

^① 全国的名义 GDP 和税收收入是在国家统计局官网直接得到，而东中西地区数据是由每个省份的数据加总得到，因此全国与东中西区域的数据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GDP 增速，2019 年税收增速更是降到了 1%，比 2008 年减少 17 个百分点。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经济增速、税收增速均下降到个位数，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因为这一时期我国的减税降费政策效应确实显著。2020 年是个特殊年份，这一年全球爆发新冠疫情，对各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而中国成为唯一经济正增长的主要国家，名义 GDP 增长率 2.99%，比上年减少 5.5 个百分点。税收增速也在下降，政府针对新冠疫情出台的短期税收优惠政策，再加上普惠性减税，所以今年的税收增速为负增长。总体来说，从图表中可以清晰的看出结论，税收增速确实减缓，这与近年来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实施有密切关系。

其次，再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角度，分析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不同区域的税收收入增速与 GDP 增速变化情况，数据如下表 4.2 所示。

表 4.2 东中西部^②三大区域名义 GDP 增速和税收收入增速变化表^③

时间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东部名义 GDP 增速 (%)	18.8	9.17	18.22	17.2	9.25	9.74	7.6	6.05	7.66	8.98	6.08	7.24
东部税收收入增速 (%)	20.72	11.11	22.62	22.92	12.37	12.93	9.63	7.19	5.48	5.43	9.9	0.97
中部名义 GDP 增速 (%)	22.35	9.73	21.64	21.38	11.19	9.51	7.79	5.12	8.35	8.66	8.56	8.44
中部税收收入增速 (%)	25.13	12.74	27.25	30.07	19.83	16.33	10.31	4.44	0.53	9.05	11.3	3.15
西部名义 GDP 增速 (%)	26.29	10.8	21.55	23.13	13.64	11.46	8.78	5.01	8.14	7.48	12.22	8.47
西部税收收入增速 (%)	24.32	17.99	32.26	31.66	18.73	14.62	9.53	3.5	-1.48	5.74	12.37	0.76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② 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辽宁 11 个省、市。中部地区：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 8 个省份。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2 个省、市、自治区。

^③ 东部地区的税收收入是由东部每个省市的地方税收收入的加总得到，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在本论文计算的地方税收入中不包含上交中央那部分税收。东部名义 GDP 也是由每个省市的 GDP 加总得到。中西部地区也是同样的计算方式。



图 4.2 东部地区名义 GDP 增速和税收收入增速折线图



图 4.3 中部地区名义 GDP 增速和税收收入增速折线图



图 4.4 西部地区名义 GDP 增速和税收收入增速折线图

从表 4.2、图 4.2、图 4.3、图 4.4 可知，东部、西部、中部三个地区的名义 GDP 增速和税收增速变化可以看出：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都出现了增速下降。其中税收增速下降最多的是中部地区，达到了 12.29 个百分点；GDP 增速下降最多的是西部，达到 15.49 个百分点。2009 年以后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取得成效，各个地区的 GDP 和税收增速是大幅度上升。其中在 2011 年，

中部税收增速上升到 30.07%，增速最快；西部地区 GDP 增速达到 23.13%，增速上升 12.23 个百分点。为了减少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2012 年，我国率先在东部地区的上海市实施营改增政策。其中，在东部地区因为试点省份比较多，所以减税政策效应比其他地区更加明显，从表中可以看出当年其税收增速便降到 12.37%。2016 年开始全国推行营改增，三大区域的税收增速也都低于了 GDP 增速。其中西部地区税收增速出现负增长为-1.48%，这与西部经济增长有限、税源有限以及减税政策有关。2018 年实施了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再加上经济增速下滑的影响，所以可以看出三个地区的税收增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西部地区下降最多，下降了 11.61 个百分点，所以，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效应显著。

4.2 整体宏观税负水平下降

我国近年来所实施减税降费的手段就是通过减少企业税负，激励其把更多的资金投入生产和创新领域，促进企业的发展，增加劳动者就业岗位，进而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所以税负的降低有利于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本部分首先从全国的宏观税负分析评价，然后再到分地区、分税种的税负分析评价，探讨减税降负的详细情况。

衡量一个国家的宏观税负，目前许多学者采用的是小口径宏观税负、中口径宏观税负和大口径宏观税负^④三种指标，所以本文也是用这三种指标来测算我国总体的宏观税负状况。

首先，从全国层面总体分析减税降费实施后，宏观税负变化状况，数据计算结果如下表 4.3 所示。

表 4.3 全国大中小口径宏观税负率变化情况

时间	税收收入	财政收入	政府收入	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小口径宏观税负率	中口径宏观税负率	大口径宏观税负率
2008	54233.79	61330.35	90455.25	321229.5	16.88%	19.09%	34.61%
2009	59521.59	68518.3	103973.6	347934.9	17.11%	19.69%	29.88%
2010	73210.79	83101.51	138286.61	412119.3	17.76%	20.16%	33.55%
2011	89738.39	103874.43	170045.53	487940.2	18.39%	21.29%	34.85%
2012	100614.28	117253.52	187023.32	538580	18.68%	21.77%	34.73%

^④ 小口径宏观税负率=税收收入/国内生产总值*100%；中口径宏观税负率=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100%；大口径宏观税负率=政府收入/国内生产总值*100%

续表 4.3

时间	税收收入	财政收入	政府收入	国内生产 总值 (GDP)	小口径宏 观税负率	中口径宏 观税负率	大口径宏 观税负率
2013	110530.7	129209.6	218444.75	592963.2	18.64%	21.79%	36.84%
2014	119175.31	140370.03	236318.97	643563.1	18.52%	21.81%	36.72%
2015	124922.2	152269.23	243170.45	688858.2	18.13%	22.10%	35.30%
2016	130360.73	159604.97	262419.93	746395.1	17.47%	21.38%	35.16%
2017	144369.87	172592.77	303807.83	832035.9	17.35%	20.74%	36.51%
2018	156402.86	183359.84	340999.68	919281.1	17.01%	19.95%	37.09%
2019	158000.46	190390.08	362430.02	990865.1	15.95%	19.21%	36.58%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从上表 4.3 可以看出,我国小口径宏观税负率在 15.95%和 18.68%之间波动,其平均税负率是 17.66%;中口径宏观税负率在 19.09%和 22.10%之间波动,其平均税负率是 20.75%;大口径宏观税负率在 28%和 37%之间变动,其平均税负率是 34.61%。大口径宏观税负率在 2008 年至 2014 年间从 28.3%不断攀升到 35%,上升了 6.7 个百分点,而且小口径和中口径宏观税负率也是连年攀升,分别上升了 1.64 个百分点和 2.72 个百分点。说明此时全国的税收负担依然在加重,结构性减税政策在这一时期效应并不理想。2015 年至 2019 年期间,我国先是开始在全国推行营改增,后又陆续出台一系列相配套的减税降费政策,此时减税效应显现了出来,小口径宏观税负率连续下降,2019 年税负率为 15.95%,与 2015 年相比,下降了 2.18 个百分点;中口径宏观税负率也是呈现连续下降趋势,2019 年税负率为 19.21%,与 2015 年相比下降了 2.89 个百分点。其中,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大口径宏观税负率分别同比下降了 1.42 个百分点和 0.14 个百分点,但值得注意的是,随后 3 年里税负率又出现了小幅上涨;尽管在 2018 年政府出台了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但是税费征管体制也是不断完善,故税收收入和费收收入增长也会较快,由上节图表可知,在此期间的税收增速是低于 GDP 增速的,说明对大口径宏观税负率的上升产生影响的会是非税收入、社保基金、或政府性基金等。

其次,从东中西三大区域分析宏观税负变化情况。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减税降费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其是通过减税来降低区域间税收负担。而可以由区域地方政府主导的税负主要是小口径宏观税负,所以接下来用地区间的税收收入占地区的 GDP 比值进行分析我国东部、

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税收负担变化情况，数据计算结果见下表 4.4。

表 4.4 东中西部区域间小口径宏观税负率表

时间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东部地区	8.04%	8.18%	8.49%	8.90%	9.19%	9.45%	9.63%	9.73%	9.54%	9.23%	9.56%	9.00%
中部地区	5.01%	5.15%	5.39%	5.77%	6.22%	6.61%	6.77%	6.72%	6.24%	6.26%	6.42%	6.10%
西部地区	6.12%	6.52%	7.09%	7.59%	7.93%	8.15%	8.21%	8.09%	7.37%	7.25%	7.26%	6.74%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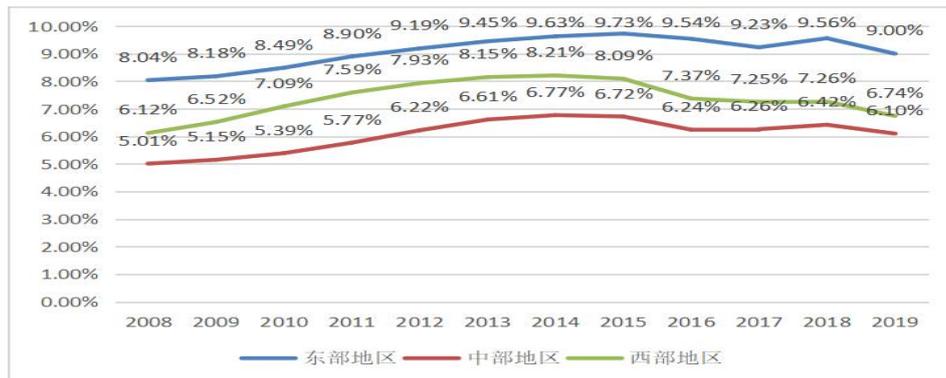


图 4.5 东中西区域间小口径宏观税负率折线图

从上表 4.4、图 4.5 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税收负担是高于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这说明我国地区之间依然存在税负差异，第一、是受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生产力水平高，经济发展速度快，其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相对较发达，税源较为充足。所以从上表可以看出：不论是地区 GDP 还是地区税收收入，东部地区都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第二、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又有相应的财税政策，比如，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为当地提供税收优惠和丰厚的财政支持。我国区域之间的税负不同，所以减税降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效应自然也会有差异。从时间跨度来看，自 2008—2014 年三大区域的税负水平都是先经历了平稳的上升，此时全国的宏观税负率也是呈上升趋势，说明这一时期的减税降费效应在各区域之间差异较小，在降低税负方面效果欠佳。从 2015 年全面推行营改增政策后，地区之间按的税负也都显示出下降趋势。其中，在 2016 年，西部地区税负水平下降了 0.72 个百分点，降幅程度高于当年的东中部地区。之后 2018 年又出台的普惠性减税政策，又再次降低了我国区域间的税负水平。其中，2019 年，三大区域的税负率都出先不同程度下降，东部地区税负率同比下降了 0.56 个百分点，降幅最多，所以大规模减税降费政

策效应在东部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4.3 具体税种的减税成效

减税降费是对具体税种做出税率或者征收方式的调整,税率调整程度和税收的减免方式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再次细分各个税种在减税政策实施后,分析其税负变化情况。

首先,从全国层面分析我国在实施减税降费措施以后,部分具体税种的宏观税负水平变化情况。其中,全国增值税税负率=(全国增值税收入^⑤+全国营业税收入)/全国GDP;全国企业所得税税负率=全国企业所得税收入/全国GDP;全国个人所得税税负率=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全国GDP,数据计算结果如下表4.5。

表 4.5 全国增值税、所得税税负率变化表

时间	增值税税负率	企业所得税税负率	个人所得税税负率
2008	7.98%	3.48%	1.16%
2009	7.90%	3.32%	1.14%
2010	7.83%	3.12%	1.17%
2011	7.78%	3.44%	1.24%
2012	7.83%	3.65%	1.08%
2013	7.76%	3.78%	1.10%
2014	7.56%	3.83%	1.15%
2015	7.32%	3.94%	1.25%
2016	7.00%	3.87%	1.35%
2017	6.78%	3.86%	1.44%
2018	6.69%	3.84%	1.51%
2019	6.29%	3.76%	1.05%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图 4.6 全国增值税、所得税税负率变化折线图

^⑤ 基于全国层面的各个税种的税收是包括中央税和地方税的总收入,而东中西地区税收只包括地方税。

从图可以看出,从全国来看,增值税的减税政策实施效果对降低税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增值税税负率总体来说呈下降趋势,2012年之前,税负率下降比较缓慢,中间年份甚至还有回升趋势,2012年,我国营改增开始试点工作,增值税税负率此后是连续呈下降趋势。

企业所得税税负率下降趋势不明显,2015年之前,其税负率是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与2008年相比,2015年企业所得税税负率上升了0.46个百分点,2015年后出现小微下降趋势,直到2019年,其税负率才下降了0.18个百分点,但是与2008年相比,其税负率还是较高。

个人所得税税负率在2018年之前,无明显下降趋势,直到2019年才出现明显下降趋势这是因为,2019年实施了新的所得税减税政策,而在此之前,个税改革力度较小,减负效果很弱。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增值税减税效果较好,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效果不如增值税。

其次,再从东中部三大区域分别分析在不同税种的税负率变化情况。

4.3.1 增值税税负水平显著降低

增值税减税政策是通过影响增值税收入增速进而作用增值税税负,达到减低宏观税负的效果,本部分是从区域角度分析增值税的降负情况,计算公式为:区域增值税税负率=(区域增值税收入+区域营业税收入)/区域GDP^⑥。

表 4.6 东中西区域间增值税税收收入和税负变化表

时间	增值税税收收入(亿元)			增值税税负率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7	6851.77	1713.64	1681.69	4.19%	2.66%	3.51%
2008	7813.74	2080.28	1999.43	4.03%	2.64%	3.31%
2009	8760.73	2309.98	2341.42	4.13%	2.67%	3.50%
2010	10305.61	2833.75	3061.46	4.11%	2.70%	3.76%
2011	12031.35	3608.41	3853.95	4.10%	2.83%	3.84%
2012	13648.06	4208.95	4423.06	4.26%	2.97%	3.88%
2013	15527.37	4837.62	5065.87	4.41%	3.11%	3.99%
2014	16826.79	5252.42	5385.91	4.44%	3.14%	3.90%
2015	18460.77	5443.33	5370.53	4.60%	3.09%	3.70%

^⑥ 区域各个税种的税收收入是指区域内各个省份的地方税收入加总,区域GDP也是各个省份的GDP加总。

续表 4.6

时间	增值税税收收入（亿元）			增值税税负率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2016	18581.82	5273.42	5076.17	4.30%	2.76%	3.24%
2017	17893.77	5223.08	5100.11	3.80%	2.52%	3.03%
2018	19357.13	5786.81	5633.52	3.87%	2.57%	2.98%
2019	19612.52	5971.38	5603	3.66%	2.45%	2.73%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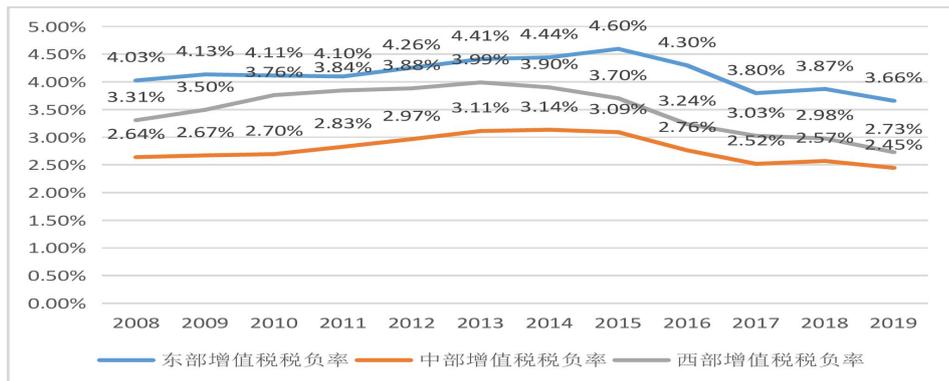


图 4.7 东中西区域间增值税税负率变化折线图

由表 4.6 可知，从税收绝对量来看，东部地区远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中部和西部相差不大。从税负率来看，东部地区税负率比中西部地区高。从图 4.7 可知，2015 年之前，东部地区增值税税负水平整体是呈上升趋势，与 2008 年相比，2015 年税负率上升了 0.57 个百分点，在同期间内，中西部地区税负水平也都是呈上升趋势，其中，中部地区上升了 0.45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了 0.39 个百分点。说明此时的减税政策对降低增值税税负效果微弱。2015 年之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行营改增，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再加上大规模减税降费，从这时开始可以看出，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增值税税负率下降趋势明显，整体来看，2019 年与 2008 年相比，东部地区增值税税负率下降了 0.37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了 0.19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下降了 0.58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税负降幅最高。说明这一时期的减税降费政策中，增值税减税效果较好，明显减少了各个区域的税收负担，这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

4.3.2 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下降趋势不明显

企业所得税收入体量较大，且在我国的税收收入中占有较大比例，处于第二的位置。所以，其政策的改革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有着重要影响，进而会影响我国各地区的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

区域企业所得税税负率=区域企业所得税收入/区域 GDP*100%，企业税所得税负率计算结果如下表 4.7。

表 4.7 东中西部区域间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和税负率变化表

时间	企业所得税收入（亿元）			企业所得税税负率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8	3004.3228	553.213	446.6005	1.55%	0.70%	0.74%
2009	2839.164	580.9001	498.3539	1.34%	0.67%	0.74%
2010	3650.5858	714.304	683.5936	1.46%	0.68%	0.84%
2011	4738.1651	1003.5322	1004.9108	1.61%	0.79%	1.00%
2012	5129.2034	1258.1762	1184.2216	1.60%	0.89%	1.04%
2013	5402.974	1336.9104	1243.4619	1.54%	0.86%	0.98%
2014	6067.6298	1455.6398	1305.3511	1.60%	0.87%	0.95%
2015	6678.3824	1499.1169	1316.2848	1.66%	0.85%	0.91%
2016	7316.4173	1513.404	1305.7655	1.69%	0.79%	0.83%
2017	8393.2085	1761.9472	1539.3345	1.78%	0.85%	0.91%
2018	9218.6754	2037.9933	1824.8231	1.84%	0.91%	0.96%
2019	9382.19	2155.91	1979.63	1.75%	0.88%	0.96%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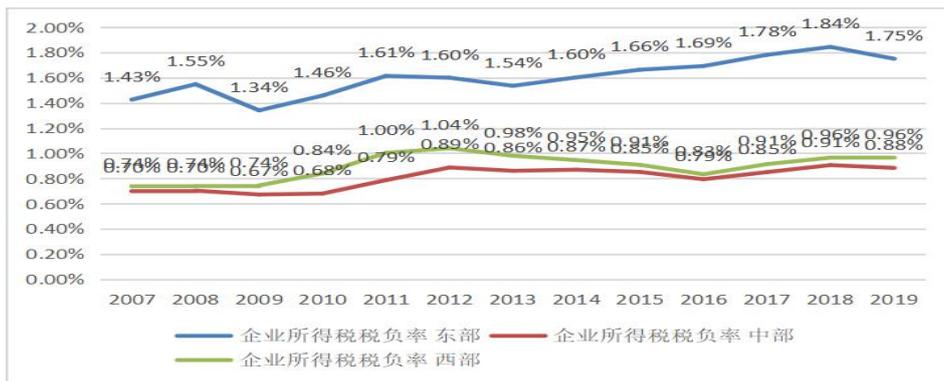


图 4.8 东中西部区域间企业所得税税负率变化折线图

由表 4.7 的数据和图 4.8 的数据曲线图走势可以看出，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负率变化趋势略有差异，东部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和税负率都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008—2018 年间，东部地区企业所得税税负率虽然有上下波动，但总趋势

是小微的上涨,与2008年相比,2018年东部地区企业所得税税负率上升了0.41个百分点。在这同一时段里,中西部地区企业所得税税负率也是有波动,但是总体趋势是小微上升。与2008年相比,2018年中部地区企业所得税税负率上升了0.2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了0.22个百分点,说明此时段内企业所得税改革对力度不大,对减轻企业负担的效果较弱,这与图4-6全国企业所得税税负率相比,总趋势相同。而2018年后实施了大规模减税降费可以看出,东中西地区的企业所得税税负率不再上升。但是2008年和2019年首尾相比,其税负率还是上升的,说明大规模减税降费对企业减负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4.3.3 个人所得税税负水平下降趋势逐渐显现

个税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其税率的高低直接关系的居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的多少,进而影响个人消费能力。区域个税税负率=区域个税税收收入/区域GDP
2008-2019年我国东中西区域间的个税税收收入及其税负率如下表4.8。

关于个人所得税税负水平变化,从表看出,在2015年之前,东中西地区变化都是比较平稳2015年之后,开始出现小幅上涨趋势,而东部地区变化较为明显,2018年三大地区的个人税所得税税负率分别达到最高点,其中,东部地区税负率是0.81%,中西部地区是0.3%和0.43%。与2008年相比,东部地区上升了0.25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上升了0.1和0.06个百分点。说明在2018年之前的减税政策并没有降低个税税负。2019年,新的个人所得税减税政策正式实施,从表中可以看出,三大区域个人税税负率明显降低其中,东部地区下降了0.22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下降了0.11和0.17个百分点。因此,新一轮的个税改革降低了个人税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需求增加,间接刺激了经济增长。

表 4.8 东中西部个人所得税收入及税负率变化情况

时间	个人所得税收入(亿元)			个人所得税税负率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8	1095.5951	191.6036	200.8691	0.56%	0.24%	0.33%
2009	1156.9465	198.8346	226.7462	0.55%	0.23%	0.34%
2010	1395.4198	244.9746	293.8946	0.56%	0.23%	0.36%
2011	1714.4605	324.2245	382.3783	0.58%	0.25%	0.38%
2012	1657.4465	297.4724	373.0938	0.52%	0.21%	0.33%

续表 4.8

时间	个人所得税收入（亿元）			个人所得税税负率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2013	1867.503	341.0599	403.9944	0.53%	0.22%	0.32%
2014	2138.5642	386.442	425.5519	0.56%	0.23%	0.31%
2015	2574.5425	404.935	467.2907	0.64%	0.23%	0.32%
2016	3035.0222	462.6015	537.3053	0.70%	0.24%	0.34%
2017	3539.0735	583.2204	663.3661	0.75%	0.28%	0.39%
2018	4060.6881	681.3596	805.4932	0.81%	0.30%	0.43%
2019	3137.87	474.39	542.09	0.59%	0.19%	0.26%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图 4.9 东中西部个人所得税税负率变化折线图

4.4 降费成效较好

减税降费政策既有对税率的降低又有对费率的降低，我国近年来的降费政策，关于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降低社保费征收率政策较多。所以本部分主要分析这两种费的降费效果。

首先，从全国层面总体分析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收费增速变化情况。数据计算结果如下表 4.9。

表 4.9 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社保基金收入变化表

时间	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		全国社保基金收入	
	收费总额（亿元）	环比增速	收入总额（亿元）	环比增速
2008	2134.86	12.52%	13696	26.67%
2009	2317.04	8.53%	16116	17.67%
2010	2996.39	29.32%	18823	16.80%
2011	4039.38	34.81%	24043	27.73%
2012	4579.54	13.37%	30739	27.85%

续表 4.9

时间	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		全国社保基金收入	
	收费总额（亿元）	环比增速	收入总额（亿元）	环比增速
2013	4775.83	4.29%	35253	14.68%
2014	5206	9.01%	39827.7	12.98%
2015	4873.02	-6.40%	46012.1	15.53%
2016	4896.01	0.47%	53562.7	16.41%
2017	4745.27	-3.08%	67154.5	25.38%
2018	3925.45	-17.28%	79254.8	18.02%
2019	3888.07	-0.95%	83550.4	5.42%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从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来看，2014年之前行政事业性收费增速上升趋势明显，2011年达到增速达到34.81%，2011年后下降趋势明显，虽然中间波动年份，但是我国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增速整体呈下降趋势，最近三年的增长率连续为负数，2018年的费收增速达到最低点-17.28%。2016年开始，收费绝对量也是连续下降，2019年比2016年收费绝对量减少了1007.94亿元。说明最近几年的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政策效果显著。

从全国社保基金收入来看，社保基金收入绝对量是呈连续增加趋势，2019年收入总额与2008年相比，增加了510%，是因为我国近年来加强了社保基金的征收力度。2017-2019年其环比增速连续出现下降，这与我国减低社保费率有关。

其次，再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分析降费情况，其数据计算结果如下表4-10。

表 4.10 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行政事业性收费变化表

时间	行政事业收费 ^⑦ （亿元）			环比增速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8	856.5	485.86	419.59	13.17%	14.05%	16.28%
2009	951.91	566.18	439.4	11.14%	16.53%	4.72%
2010	1298.55	686.55	615.27	36.42%	21.26%	40.03%
2011	1703.23	1037.48	894.61	31.16%	51.11%	45.40%
2012	1938.64	1228.38	1035.31	13.82%	18.40%	15.73%
2013	2040.19	1258.36	1198.79	5.24%	2.44%	15.79%
2014	2171.58	1371.78	1296.98	6.44%	9.01%	8.19%
2015	1955.35	1284.52	1172.21	-9.96%	-6.36%	-9.62%
2016	1927.9	1278.32	1210.28	-1.40%	-0.48%	3.25%
2017	1871.77	1287.61	1145.83	-2.91%	0.73%	-5.33%

^⑦ 区域间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是区域内各个省份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数额的加总。

续表 4.10

时间	行政事业收费 ^⑥ (亿元)			环比增速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2018	1487.07	1018.11	1015.72	-20.55%	-20.93%	-11.36%
2019	1620.98	1028.61	833.79	9.00%	1.03%	-17.91%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从不同区域看，降费政策造成的收费变化趋势大体相同，小有差异。

横向来看，行政事业性收费依然是东部较多，中西部次之，这再次验证了税费收入与经济发展有密切联系。纵向来看，2008—2014年间，东中西地区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是连续增加的，这与全国的收费变化趋势相同。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环比增速在这期间几乎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速。2014—2019年间，三大地区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都不同程度出现了下降趋势，其环比增速降到0以下，尤其2018年，东部、中部大幅度降到-20%以下。2019年东部、中部的收费小幅度回升，而西部地区继续下降。可见行政事业降费主要效果还是体现再最近几年的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上。

表 4.11 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社保基金收入变化表

时间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⑦ (亿元)			环比增长率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2011	13262.63137	5388.835893	5168.660285	—	—	—
2012	16293.13852	6308.886516	6002.568733	22.85%	17.07%	16.13%
2013	18505.02801	7306.462934	7016.54962	13.58%	15.81%	16.89%
2014	21046.9902	8129.06202	7890.303663	13.74%	11.26%	12.45%
2015	24708.13105	9151.828323	8789.897462	17.40%	12.58%	11.40%
2016	28399.7165	10049.17614	11650.01548	14.94%	9.81%	32.54%
2017	33048.66057	14452.77386	15639.9978	16.37%	43.82%	34.25%
2018	38962.02923	18391.65443	17046.30119	17.89%	27.25%	8.99%
2019	42436.4783	18955.24446	17728.41182	8.92%	3.06%	4.0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经整理计算而得

由表可知 4.11，横向来看，社保基金收入与其他税收收入一样，是东部地区较高，中西部较低。纵向来看，东中西三大地区社保基金费收入是连续增加，一方面是我国降低了社保费率，吸引了更多人参保。二是我国不断加大征缴力

^⑥ 区域间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是区域内各个省份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数额的加总。

^⑦ 因为生育保险 2019 年没有数据，扣除生育保险费。医疗保险 2011 年之前没有数据，所以，本节社保基金收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由 2011-2019 年间的的数据相加得到。

度，推进社保覆盖更大范围。虽然社保费收入连续增加，但是从 2017—2019 年间可以看出三大区域的环比增长率均是大幅度下降，与 2017 年相比 2019 年东部地区环比增速下降 7.45 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分别是 40.76 个百分点和 30.25 个百分点，降幅比较明显。社保基金费增收量的减少，为企业减轻了负担，这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4.5 企业研发经费投入量保持高水平增长

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会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有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销售利润，可支配资金将更加充裕，那么企业将会加大研发投入经费，用于开发新产品，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能力。所以许多企业再减税降费政策的支撑下会增加研发投入金额。

首先，从全国层面分析所有规模以上企业 R&D 经费变化情况。

表 4.12 全国规模以上企业 R&D 经费变化表

时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经费总量(万元)	5993805	7200645	8318400	9254258	1001393	1094465	1201295	1295482	1397109
增长率	—	20.13%	15.52%	11.25%	8.21%	9.29%	9.76%	7.84%	7.84%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注：2010 年数据缺失，所以只选取 2011—2019 年的数据）

从表 4.12 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的研发经费总量每年连续增加，从 2011 年 5900 多亿增加到 2019 年的 13000 多亿，增加 2 倍多。从同比增长率来看，2012—2015 年从 20.13% 下降到 8.21%，下降近 12 个百分点，从 2015 年以后增长率比较平稳，维持在 8% 左右的年增长率。研发经费的增加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回报，也促进社会整体经济大发展。

其次，再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分析规模以上企业 R&D 经费变化。

从东中西三大区域对比可知，从研发经费的总量来看，东部地区研发费用投入量最多，每年的研发投入量比西部和中部的总和还要多，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差异巨大，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越多，研发投入越多，经济就越发达。从同比增长率来看，东中西部共同点就是在 2015 年之前 R&D 经费总量同比增长率是连续大幅度下降，说明当时的减税降费政策对促进研发投入经费效果不明显。从 2015 年之后，三大区域的研发经费增长率开始回升，说明

近年来的营改增和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对促进企业创新发展作用显著。东中西部的异同点就是，东部的研发经费同比增长率比中西部要低，尤其是 2019 年，中西部的增长率超过东部 2 倍多，说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潜力很大。

表 4.13 东中西部规模以上企业 R&D 经费变化表

时间	规模以上企业 R&D 经费总量（万元）			R&D 经费总量同比增长率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2011	43752621	10683356	5502080	—	—	—
2012	52106189	13009512	6890751	19.09%	21.77%	25.24%
2013	59865244	15245242	8073520	14.89%	17.19%	17.16%
2014	66124316	17226485	9191788	10.46%	13.00%	13.85%
2015	71292457	18733701	10113172	7.82%	8.75%	10.02%
2016	77264537	20762826	11419224	8.38%	10.83%	12.91%
2017	84251509	23305810	12572272	9.04%	12.25%	10.10%
2018	89982809	25855628	13709826	6.80%	10.94%	9.05%
2019	94536176	29631064	15543751	5.06%	14.60%	13.38%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注：2010 年数据缺失，所以只选取 2011—2019 年的数据）

4.6 产业结构优化状况较好

减税降费带来的红利能够激励社会的创业和创新，尤其使针对企业的研发费用扣除、投资抵免等优惠政策会减轻企业的研发、生产成本，大大刺激了企业更新换代和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的欲望。这有利于我们国家的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完善。所以减税降费政策是我国当前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因此，本部分主要分析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情况，分析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指标是：产业结构增加值/全国 GDP 总量。

首先，从全国层面总体描述我国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总量比值变化情况，计算结果如下表 4.14。

表 4.14 全国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变化表（单位：%）

时间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第二产业占比	46.97	45.96	46.5	46.53	45.42	44.18	43.09	40.84	39.58	39.85	39.69	38.59
第三产业占比	42.86	44.41	44.18	44.29	45.46	46.88	48.27	50.77	52.36	52.68	53.27	54.27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由上表 4.14 可知，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可达到 90%，可

见经济的增长主要靠这两种产业的带动。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连续呈下降趋势，从 2008 年的 46% 降到 2019 年的 38%，下降了 8.38 个百分点，但是对拉动 GDP 增长仍然占有较大贡献。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则是连续增加，从 2008 年的 42% 上升到 2019 年的 54%，增加了 11.41 个百分点。从 2015 年以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就超过一半，可以说是当前 GDP 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另外，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合计占 GDP 比重也是逐年连续增加，故第一产业比重应该是逐年下降的。这说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良好效果，减税降费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次，从东中西不同区域之间再仔细研究其产业结构变化情况，数据计算结果如下表 4.15。

表 4.15 东、中、西三大地区第二、三产业调整变化表

时间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8	50.83	50.50	47.65	42.24	35.37	37.62
2009	49.53	49.93	47.46	43.72	36.49	38.81
2010	49.72	51.99	49.99	43.79	35.10	36.87
2011	49.35	52.90	50.92	44.24	34.66	36.34
2012	48.23	52.05	50.13	45.38	35.58	37.28
2013	46.57	49.88	48.26	47.33	38.20	39.66
2014	45.80	48.71	47.39	48.28	39.66	40.71
2015	43.69	45.76	44.64	50.49	42.83	43.39
2016	42.10	44.21	42.95	52.33	44.81	45.18
2017	41.48	43.89	41.19	53.63	46.53	47.42
2018	39.79	41.03	38.33	55.41	49.92	50.91
2019	38.89	40.62	37.92	56.33	50.22	51.13

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官网整理计算而得

纵向来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在东部、中部都是逐年降低，在西部地区则是先上升后下降，东部地区从 2008 年的 50.38% 降到 2019 年的 38.89%，下降了 11.94 个百分点，而中部、西部地区在此期间分别下降了 9.88 个百分点和 9.73 个百分点，其下降幅度东部最快。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在东部、中部都是逐年增加，在西部则是先上升、后下降、最后上升。在 2008—2019 年间，东部地区从 42.24% 上升到 56.33%，上升了 14.09 个百分点，而中部、西部地区分别上升了 14.85 个百分点和 13.15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上升幅度最快。

横向来看，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占比在 2012 年之前一直高于第三产业占比，2012 年之后，第三产业占比超过了第二产业，2019 年第三产业占比达到最大值 56.33%，所以总的来说，第三产业为东部地区发展发挥了最主要作用。对于中部地区来说，其第二产业占比较为强势，与第三产业相比，其 GDP 贡献率不落下风。尤其使在 2019 年，占比仍然达四成以上，2016 年其第三产业占比才超过第二产业。西部地区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比是变化较为复杂。2008—2011 年，其第二产业占比从 47.65% 一直上升到 50.92%，第三产业则是从 37.62% 上升到 38.81% 然后又下降到 36.34%。2012 年后，其第二产业占比开始逐年下降，第三产业占比开始上升，2016 年，其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逐渐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坚力量。

总体来看，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情况较好，第三产业占比不断增加，各个地区都达到了 50% 以上，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各个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4.7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保持高水平增长

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了企业和居民个人的税费负担，在同等收入的条件下，其可支配收入增加，企业或个人有能力满足更高的消费需求，那么企业的供给也会增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将会提高。

首先，从全国层面分析减税降费背景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变化情况。

表 4.16 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及同比增速变化表

时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同比增长率
2008	110994.6	22.46%
2009	128331.3	15.62%
2010	152083.1	18.51%
2011	179803.8	18.23%
2012	205517.3	14.30%
2013	232252.6	13.01%
2014	259487.3	11.73%
2015	286587.8	10.44%
2016	315806.2	10.20%
2017	347326.7	9.98%
2018	377783.1	8.77%
2019	408017.2	8%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从表 4.16 可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每年增加，从 2008 年 110994.6 亿元增加到 2019 年 408017.2 亿元，总量增长了近 4 倍。从增长率来看，虽然是连续每年呈下降趋势，但目前来看还是保持了 8% 以上的高速增长状态，说明我国的消费能力很强，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消费增速甚至超过了 GDP 增速，减税降费政策做出了很大贡献。

其次，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分析减税降费背景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变化情况。

表 4.17 东中西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化表

时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同比增长率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8	66738.6	28233.5	19857.9	22.03%	23.97%	23.28%
2009	76871.1	32768.8	23038.7	15.18%	16.06%	16.02%
2010	91142.3	39105	27760.3	18.57%	19.34%	20.49%
2011	107076.7	46647.9	33481.1	17.48%	19.29%	20.61%
2012	121589.9	53953.5	38889.1	13.55%	15.66%	16.15%
2013	136961.5	61529.7	44351.5	12.64%	14.04%	14.05%
2014	152804.9	69241.5	49849.9	11.57%	12.53%	12.40%
2015	168276.2	76926.9	55124.1	10.12%	11.10%	10.58%
2016	184557.3	85532.3	61488	9.68%	11.19%	11.54%
2017	201377	94429.6	68098.8	9.11%	10.40%	10.75%
2018	201528	98074.5	78180.8	0.07%	3.86%	14.80%
2019	215852.8	107659.8	84504.7	7.11%	9.77%	8.09%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从东中西部来分析社会消费品零售情况，由表 4.17 可知东部地区零售额总量最多，从 2008 年的 66738.6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215852.8 亿元，总量增长了 3 倍多。中西部地区虽然总量较少，但是增量很多，从 2008—2019 年，中部地区零售额增加了近 4 倍，西部地区总量增加了 4 倍多。从同比增长率来看，2008—2019 年，东中西三大区域不同程度的出现增长率下降，这与全国的变化趋势相同。除了 2018 年东部、中部地区，出现较低的增速外，总的来说各个地区的消费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速，说明消费需求对地区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减税降费为政策为各地消费需求的增加提供了巨大动力。

4.8 小结

本节主要是研究减税降费实施后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分析，首先是介绍一下全国经济变化状况，然后又分东中西区域仔细对比分析研究。

经研究发现：减税降费的实施降低了税收增速、减轻了总体宏观税负、对降低增值税税负的效果显著，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降负效果微弱，降费政策实施有效降低了社保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增速。在减税政策降低了宏观税负后，我国经济也发生了变化，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投入量增加，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也是持续增加。

在不同区域的对比分析中，在上述的税收增速、宏观税负变化、具体税中的税负变化情况、以及降费政策带来的社保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企业研发经费投入量变化、产业结构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有不同的变化状况，分别给出了详细的描述。

5 减税降费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5.1 实证模型建立说明

5.1.1 研究假设

不论是从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学派、还是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都可以推出减税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是有正向影响的。减税降费首先会对政府税收收入有直接影响，所以税收效应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因此，我们假设减税降费会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接下来，本部分将从收入效应、激励效应和聚集效应这三个方面分析减税降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第一，收入效应：一般经济学意义的收入效应是指某一商品其价格变动进而引起消费者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动，这是从消费者角度去理解收入效应，而税收的收入效应主要从企业和居民角度分析其经济意义。首先，从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总体来看，政府的目的就是减少企业和居民的缴税负担，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其次，从具体税种的减税政策来看，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税率的降低，将使企业税收负担减少，可使用资金增加。增值税又属于价外税，具有转嫁性，企业为了追求利益自然会把增值税转嫁给最终的消费居民，那么消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会减少，而增值税率降低，就解决了这一问题。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属于直接税，不具有转嫁性，直接对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组织进行征税，企业得税减税政策，使企业成为直接受益者，其应缴税款减少，在同样的收入水平下，企业的利润将会增加，可支配资金充裕。个人所得税减税政策实施，可使居民纳税负担降低，可支配收入增加。从以上看来，减税降费增加了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这将会带动更多的投资与消费，刺激经济增长。

第二，激励效应：减税降费政策实施，通俗来说是将本应由政府收取的部分资金，现在又返还给企业和居民，那么企业和居民的整体税收负担减少，可支配收入增加，整个经济社会的资源更充裕，市场主体生产和消费积极性提高，对社会经济增长有刺激作用，所以这就衍生出了税收的激励效应。从需求侧角度理解，个税通过提高起征点和增加专项扣除改革，使居民收入相对增加，这会激励居民

把现有的收入投入到消费、投资领域减税通过提高个人的消费能力，进而刺激当地消费水平提高，提高经济水平，从供给侧角度看，“营改增”、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改革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内部留存收益，减少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扭曲程度，这会鼓励企业去引进高水平的企业管理者，扩大生产投资规模，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加就业岗位，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聚集效应；减税降费的聚集效应是指减税政策对相关企业具有引力作用，能够促进同类型的、相关联的企业集中于某一处，使得各种生产要素能高效的流动结合，逐渐形成相关产业园区，这就形成了规模经济，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我国当前减税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力度很大，为了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必要扶持高新技术产业，通过减税政策，促使高新技术产业区域的形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综上所述，假设减税降费政策实施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此，本部分接下来将用实证模型进行分析。

5.1.2 指标的选取

被解释变量：经济水平（ $\ln gdp$ ）。本文选取实际 gdp 表示各省、市、自治区的在不同年份的经济水平，是以上一年为基期，对名义 gdp 进行平减得到实际 gdp ，对其取对数是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使数据更加平稳。

解释变量：增值税税负率（ $vtax$ ）：为了数据前后一致，把 2008 年后的营业税收入也并入到增值税中，所以增值税税负率是当期增值税与营业税收入之和与当期 GDP 的比值。企业所得税税负率（ $ctax$ ）：企业所得税收入与 GDP 比值。个人所得税税负率（ $ptax$ ）：个人所得税收入与 GDP 比值。非税收入费负率（ fei ）：非税收入与 GDP 的比值。

控制变量：地区常住人口（ $\ln population$ ）：各个地区的年末常住人口绝对量取对数。地区财政支出（ $\ln finance$ ）：各个地区的财政支出名义绝对量，并以上一年为基期，对名义财政支出绝对量经过平减之后，得到实际财政支出绝对量，然后再取对数。

5.1.3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要研究的内容是减税降费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所以，选取 2008—2019 年间的的数据，从 2008 年结构性减税开始一直到 2019 年的大规模减税降费，出于数据可得性，所以数据选取到 2019 年。数据选区的范围是这 12 年间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因为地区数 N 大于年份 T ，所以本文选取的是短面板数据。模型中的核心被解释变量实际 gdp ，核心解释变量增值税税负率、企业所得税税负率、个人所得税 税负率、非税收入费率，以及控制变量常住人口、财政支出，其数据均是从国家统计局官网或者《中国统计年鉴》选取并经过处理计算而得。

5.1.4 模型的设立

首先，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经济的发展水平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减税降费政策只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其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实施时，产生的经济效应必然会存在一些差异，所以再考虑了以上情况下，本文决定设立变截距模型，又在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自基础上，最终设定的实证模型如下：

$$\ln gdp = \beta_0 + \beta_1 vtax_{it} + \beta_2 ctax_{it} + \beta_3 ptax_{it} + \beta_4 fei_{it} + \lambda_1 \ln population_{it} + \lambda_2 finance_{it} + \alpha_{it} + \varepsilon_{it}$$

其中， i 代表各个地区， t 表示不同年份， β_i ($i=1, 2, 3, 4$) 表示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 λ_i ($i=1, 2$) 表示各个控制变量的系数， α_{it} 表示个体效应， ε_{it} 表示误差项， β_0 表示截距项。

5.2 减税降费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5.2.1 描述性统计

由表 5.1 的统计结果可知，我国东部地区的实际 GDP 取对数后的平均水平是 10.9，其标准差则维持在一个较低数值 0.888，若从最值来看，其最大值是 7.207，最小值是 11.57，可以推出东部地区虽然总体经济发达，但是其内部各省市之间还是存在差距，若是从 GDP 绝对量相比较其差距会更为显著。从各个地区的税负水平来看，增值税税负 ($vtax$) 和非税收入费负 (fei) 的平均值较大，所得税税负水平相比较小，但从最大值最小值比较来看，也是增值税税负和非税收入费负的差距较大，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税负水平存在差异。从年末常住人口人口、地

区财政支出的对数水平来看，其平均值较高，标准差维持在较低数值。从总体来看，所有变量的标准差都小于平均值，说明无极端值，数据较平稳。

表 5.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样本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gdp	132	10.09	0.888	7.207	11.57
vtax	132	4.556	1.890	2.206	11.10
ctax	132	1.798	1.143	0.650	4.744
ptax	132	0.674	0.566	0.189	2.357
fei	132	2.162	1.025	0.558	6.336
lnfinance	132	8.310	0.740	5.880	9.758
lnpopulation	132	8.277	0.786	6.750	9.352

5.2.3 平稳性检验

为了确保需求能取得东部地区经济面板数据可以进行实证研究，用单位根检验方法验证其数据是否平稳，检验结果如下表。

由表 5-2 可知，增值税税负率、企业所得税税负率、非税收入费负率原序列检验 P 值小于 0.05，数据平稳，其他变量检验结果不平稳。把所有变量一阶差分后再检验，结果是全部平稳。

表 5.2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原序列检验		一阶差分序列检验	
	p-value	结论	p-value	结论
经济水平 lngdp	0.9133	不平稳	0.0000	平稳
增值税税负率 vtax	0.0012	平稳	0.0000	平稳
企业所得税税率 ctax	0.0000	平稳	0.0000	平稳
个人所得税税负率 ptax	0.0793	不平稳	0.0001	平稳
非税收入费负率 fei	0.0106	平稳	0.0000	平稳
常住人口 lnpopulation	0.4541	不平稳	0.0000	平稳
实际财政支出 lnfinance	0.3658	不平稳	0.0000	平稳

5.2.4 豪斯曼检验

对于本文东部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需要确定其适用哪一种数据模型，是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需要通过 hausman Test 可得到明确的答

案。

由 stata15 软件的 hausman Test 结果得知，其统计量值是 4.23，P 值是 0.6459，所以东部地区的数据更适用于随机效应回归模型。

5.2.5 实证结果分析

由回归结果表可知，东部地区，其增值税税负率 $vtax$ 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对数 $lngdp$ 有显著的负向关系，税负率每降低 1%，实际经济水平将提高 3.8%。企业所得税税负率 $ctax$ 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对数 $lngdp$ 由显著的负向关系，企业所得税率每降低 10%，实际经济水平将升高 4.61%，个人所得税税负率虽然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不显著性，但仍然呈负向关系说明个税税负率过高，会不利于经济发展。控制变量年末常住人口 $lnpopulation$ 和财政实际支出绝对量对数 $lnfinance$ 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极为显著相关，人口数量和财政支数量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经济学上也是意义很大。

表 5-3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经济水平 $lngdp$ ）	
解释变量	增值税税负率 $vtax$	-0.0380*** (0.0088)
	企业所得税税负率 $ctax$	-0.0461* (0.0270)
	个人所得税税负率 $ptax$	-0.0197 (0.0423]
	非税收入费率 fei	-0.0467*** (0.0095)
控制变量	常住人口 $lnpopulation$	0.354*** (0.0718)
	实际财政支出 $lnfinance$	0.785*** (0.0189)
N	132	
R-sq	0.9767	

*** $p < 0.01$, ** $p < 0.05$, * $p < 0.1$

5.3 减税降费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5.3.1 描述性统计

中部地区只包括了 8 个省份，所以观测样本数量相对较少，每个变量只有 96 个，从经济水平 $\ln gdp$ 来看，其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不大，标准差数值也是维持在较低水平，所以中部地区之间经济水平差异不大。从各个税的税负率和非税收入费负率的数据来看，增值税税负率 $vtax$ 和非税收入费负率 fei 的最值差异较大，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差较小。从控制变量来看，地区常住人口对数 $\ln population$ 和实际财政支出对数 $\ln finance$ 标准差较小，最值相差不大，说明中部地区常住人口和实际财政支出数量差异较小。从总体来看，所有变量的标准差都小于平均值，说明无极端值，数据较平稳。

表 5.4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样本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 gdp$	96	9.760	0.508	8.721	10.85
$vtax$	96	3.116	0.765	1.980	4.953
$ctax$	96	0.905	0.283	0.387	1.835
$ptax$	96	0.269	0.0713	0.143	0.448
fei	96	2.759	0.751	1.438	5.674
$\ln population$	96	8.516	0.375	7.898	9.174
$\ln finance$	96	8.188	0.522	6.972	9.173

5.3.2 平稳性检验

本文选取的中部地区面板数据是否平稳，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下表 5-5。由表 5-5 可知，个人所得税税负率、非税收入费负率单位根检验结果 P 值小于 0.05，数据平稳，其他变量的检验结果 P 值都大于 0.05，数据不平稳，所有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检验结果 P 值全部是 0，数据全部平稳。

表 5.5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原序列检验		一阶差分序列检验	
	p-value	结论	p-value	结论
经济水平 $\ln gdp$	0.7029	非平稳	0.0000	平稳
增值税税负率 $vtax$	0.2732	非平稳	0.0000	平稳
企业所得税税负率 $ctax$	0.2808	非平稳	0.0000	平稳
个人所得税税负率 $ptax$	0.0470	平稳	0.0000	平稳
非税收入费负率 fee	0.0007	平稳	0.0000	平稳
常住人口 $\ln population$	0.5218	非平稳	0.0000	平稳
实际财政支出水平 $\ln finance$	0.2050	非平稳	0.0000	平稳

5.3.3 豪斯曼检验

由于每个地域的经济数据有差异,对于中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是适用哪一种实证模型,通过 hausman Test 可得到明确的答案。

由 stata15 软件的豪斯曼 hausman 检验结果得知,其统计量值是 36.39,伴随概率 P 值是 0.0001,所以,适用于固定效应模型。

5.3.4 实证结果分析

从回归结果表 4-6 可知,在中部地区,其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与东部地区相比效果较弱。增值税税负率 $vtax$ 与国内生产总值对数 $lngdp$ 之间作用显著,增值税税负率每降低 10%,国民生产总值将上升 0.34%。也就是说增值税税负率的降低是有利于经济水平上升的。企业所得税税负率 $ctax$ 和个人所得税税负率 $ptax$ 对促进国内生产总值 $lngdp$ 增长,作用不显著,这是减税的政策效应在中部地区有滞后性有关。从非税收入费负率来看,费负率的降低对促进经济总量增长并不显著,但是从回归结果的数值符号看,降低费负率对 $lngdp$ 的作用是正向,说明费负率降低有利于经济总量增长。从控制变量来看,常住人口和财政支出依然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显著程度极高。

表 5.6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 (经济水平 $lngdp$)	
解释变量	增值税税负率 $vtax$	-0.034* (0.0208)
	企业所得税税负率 $ctax$	0.233 (0.0558)
	个人所得税税负率 $ptax$	0.179 (0.1355)
控制变量	非税收入费负率 fei	-0.0182 (0.0146)
	常住人口 $lnpopulation$	3.078*** (0.3892)
	实际财政支出 $lnfinance$	0.667*** (0.0189)
N	96	
R-squared	0.984	

*** $p < 0.01$, ** $p < 0.05$, * $p < 0.1$

5.4 减税降费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5.4.1 描述性统计

从表 5.7 的统计结果可知,西部地区样本观测数量相较其他地区最多,样本数量多会使统计结果更加可靠。被解释变量 $\ln gdp$ 的标准差较高,其最大值最小值相差大,可以说明西部地区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从各个解释变量来看,增值税税负率和非税收入费负率的最值都有较大差距,一是减税降费造成的数据变化波动较大,另一方面说明西部各地区之间税负存在不平衡。从控制变量来看,常住人口和财政支出上下限差异不大。从总体来看,所有变量的标准差都小于平均值,说明无极端值,数据较平稳

表 5.7 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名称	观测样本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 gdp$	144	8.844	1.058	5.932	10.69
$vtax$	144	3.929	0.891	2.344	6.389
$ctax$	144	0.948	0.260	0.318	1.930
$ptax$	144	0.421	0.333	0.164	3.351
fei	144	3.235	0.993	0.605	6.324
$\ln finance$	144	7.771	0.752	5.638	9.181
$\ln population$	144	7.699	0.941	5.677	9.033

5.4.2 平稳性检验

表 5.8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原序列检验	结论	一阶差分序列检验	结论
	p-value		p-value	
经济水平 $\ln gdp$	0.4671	非平稳	0	平稳
增值税税负率 $vtax$	0.1303	非平稳	0	平稳
企业所得税税负率 $ctax$	0	平稳	0	平稳
个人所得税税负率 $ptax$	0	平稳	0	平稳
非税收入费负率 fee	0	平稳	0	平稳
常住人口 $\ln population$	0.4573	非平稳	0	平稳
实际财政支出 $\ln finance$	0.2348	非平稳	0	平稳

对西部地区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验证其数据是否平稳，检验结果见 5.8。由表 5.8 可知，解释变量中企业所得税税负率、个人所得税税负率、非税收入费负率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 P 值都小于 0.05，说明数据是平稳的，但是其他变量的检验结果 P 值都大于 0.05，取数据序列不平稳，所有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再检验结果显示 P 值全部为 0，数据序列全部平稳。

5.4.3 豪斯曼检验

分析减税降费对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模型适用于固定或是随机，也是通过 Hausman Test 可得到明确的答案。

由 stata15 软件的 Hausman Test 结果得知，统计量数值等于-0.87，统计量为负值需要进一步分析，由修正后的 hausman Test 结果得知，统计量值是 9.12，伴随概率 P 值是 0.1667，所以，应该选用固定效用模型。

5.4.4 实证结果分析

表 5-9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经济水平 lngdp）
解释变量	增值税税负率 vtax	-0.0170* (0.0095)
	企业所得税税负率 ctax	-0.0302 (0.0306)
	个人所得税税负率 ptax	-0.0348 (0.0271)
	非税收入费负率 fei	-0.0228** (0.0089)
控制变量	常住人口 lnpopulation	0.487*** (0.0800)
	实际财政支出 lnfinance	0.838*** (0.0216)
	N	144
	R-squared	0.9689

*** p<0.01, ** p<0.05, * p<0.1

由表 5-9 回归结果可知，在西部地区，增值税税负率 vtax 与国民生产总值 lngdp 在 10%的水平上较为显著，税负率每降低 10%，经济水平将升高 0.17%。企

业所得税税负率和个人所得税税负率都不显著,但是它们与经济增长是呈反方向关系,也可以说明所得税税负率的降低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非税收入的费负率 fei 与国内生产总值对数 $lndp$ 在 5%的水平上显著,每降低 5%非税收入负担,经济水平将上升 2.28%。对于控制变量常住人口和财政支出,其显著程度很高,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

5.5 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实证结果对比分析

从表 5.10 可以看出,我国的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在不同地区各有差异。其中,增值税减税政策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较为显著,特别是对东部影响最大,税负率每降低 1%,实际经济水平 $lndp$ 指数上升 3.8%。企业所得税的减税政策对经济发展影响在东部效果显著,中部地区不显著,西部地区虽然也不显著,但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与企业所得税税负率是反向关系。个人所得税减税政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效果,在东中西三大区域都不显著,仅在东、西部表现出个税税负率高低对经济发展影响呈现相反方向。降费政策的实施在在东西部地区效果都显著,其费负率的降低对东部地区影响最显著,其次是西部地区,最后是中部地区。从控制变量来看,地区常住人口对数和实际财政支出绝对量对数在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显著影响,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作用巨大。

表 5.10 三大区域实证结果对比分析

变量名称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增值税税负率 $vtax$	-0.0380***	-0.034*	-0.0170*
企业所得税税负率 $ctax$	-0.0461*	0.233	-0.0302
个人所得税税负率 $ptax$	-0.0197	0.179	-0.0348
非税收入费负率 fei	-0.0467***	-0.018	-0.0228**
常住人口 $lnpopulation$	0.354***	3.078***	0.487***
实际财政支出 $lnfinance$	0.785***	0.667***	0.838***

*** $p < 0.01$, ** $p < 0.05$, * $p < 0.1$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总的来说,增值税税负率的降低对经济总量的增加具有显著作用,这是因为我国对增值税改革力度较大,从增值税转型、结构性减税、营改增、普惠性减税,在这四个阶段增值税不断被调整,增值税税负明显降低,带来的经济效

应巨大，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其在以后的减税降费政策制定，依然是改革的重点内容，应该继续降低增值税税率，完善税制，有效发挥增值税降低生产成本，稳定经济发展的作用。

(2) 企业所得税税负的降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只在东部地区显著，在中、西部不显著，原因其一，减税降费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优惠较多，而东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数量更多，企业税感更强，所以其减税效果更好，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数量较少，企业税感较弱等原因，所以造成中西部地区企业所得税减税经济效果不显著。其二，2017年之后，我国政府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而企业所得税改革在这一时期力度才开始加大，之前的结构性减税和营改增政策，对企业所得税改革贡献力度不大，再加上企业所得税减税的经济效应存在时滞，所在部分地区就不显著。

(3) 个人所得税负降低提高经济水平的显著程度，在东中西三大区域都不高。其原因和企业所得税部分相似，企业所得税改革力度也是在最近两年才加大，在大规模减税降费实施之前，个人所得税减税改革力度小，所以若是从2008-2020年实证评估个税减税效应，回归结果自然不会显著。但是从2018-2020这三年的所得税减税效果来看，不论是企业所得税或者个人所得税，其减税成果巨大。

(4) 非税收入负担的降低对经济水平提高在东部和西部有显著作用，对中部显著程度不高，但是从回归结果的符号来看，非税收入费负率的降低会促进经济总量的上升。总的来看降费政策实施是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我国应继续推定费率的降低，减轻经济社会负担。

(5) 常住人口数量对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是同方向关系，人口的增长，为城市带来更多的劳动力，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同时，人口的增长也会是消费需求增加，进而刺激经济增长，所以，人力资本是到当地的珍贵资源。所以，适当制定一些鼓励人口增长的生育政策，二要继续推行城镇化运动，充分发挥人口的经济优势。

(6) 财政支出总量对GDP总量增加作用也非常显著，财政支出属于积极财政政策，可用于民生领域、提供一般公共服务，能拉动内需，有助于经济增长，所以，当前的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要有相对应的财政政策支持，从分发

挥出减税降费政策红利。

5.6 小结

通过，选取 2008—2019 年东部、中部、西部面板数据，建立实证模型，经过假设检、实证回归结果，得到减税降费政策实施下，不同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对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状况。

从以上实证结果来看，增值税改革效果最为显著，给非税收入费负率的降低效果也很显著，其次是企业所得税改革在东部地区效果相对显著，个税改革效果在三大区域都不显著，控制变量对其经济发展影响显著。

减税政策在不同区域效果显著程度不同，这与经济发展水平高低、资源禀赋状况、以及政策执行力度强弱等等有关。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政策实施是在不同区域也会产生不同效果，所以在以后的减税降费改革中要重视区域差异，更好的释放减税降费红利。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研究了减税降费实施后,我国区域经济的变化情况,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从减轻社会税负方面看:(1)总体来看:减税降费使得我国税收增速明显放缓;总体宏观税呈现下降趋势;在具体税中的减税成效中,增值税税负下降趋势明显,减税效果较好,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效果较弱;收费增速在最近几年出现下降趋势。(2)分区域来看:东中西地区税收增速都明显下降;小口径宏观税负也都呈现下降趋势;增值税减税,东部、西部税负降底更加明显;降费情况,东中西部都出现下降趋势,相对来说东部地区更明显。

其次,从减税降费经济效应状况来看:(1)总体来看:减税降费从供给和需求两端都产生了更显著的经济效应,企业研发投入经费上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2)分区域来看:企业 R&D 经费投入同比增长率是中、西部地区较高,而企业 R&D 经费投入绝对量东部最高;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更高;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率是中、西部地区较高,而消费品零售额总量东部最多。

最后,从减税降费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实证结果来看:

(1)增值税减税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效果较好,在东中西三大区域都显著的,我国增值税改革力度较大,取得效果较好,在接下来的减税降费改革,要注重增值税的作用。(2)企业所得税减税在东部地区取得了较明显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但总的来说企业所得税的下降时有利于企业发展进而有益于经济的发展。(3)个税改革在东中西三大区域没有取得显著效果,个人所得税税负的降低对促进 GDP 总量增长方面不显著,(4)降费政策实施效果较好,非税收入费负率的下降对促进经济增长在东部、西部地区显著,中部地区不明显,但是总的来说非税收入负担的下降对经济增长是由正向作用的。(5)地区常住人口和地区实际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也有着重要作用,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可以激励居民消费、投资、创业等,减税政策的是积极的财政政

策，有相对应的财政政策配合，减税的同时应注意财政支出效率。（6）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其经济效应不会当期完全显现出来，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6.2 政策建议

6.2.1 继续完善税制设计，促进减税降费红利持续释放

减税降费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随着政策的推进，要继续优化税制设计，通过税制设计的完善，促进减税政策不断优化，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1）朝着减并税率的方向，继续推进增值税改革

通过上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发现，增值税减税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宏观税负，对各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作用显著，特别是近年来的大规模减税降费实施以来，增值税的政策效力有所加强，所以，增值税改革要持续进行。我国增值税近年来的改革方向是降低税率、减少税挡，税率的简并可以减少税收扭曲和降低税收征管成本，在未来的税制改革中，建议继续坚持这个方向，当前我国的增值税是3档税率，其改革空间依然存在，从国际上看，开征增值税的国家，其税率一般是设置1档或者2档，借鉴国际成熟经验，我国可以两档的基础上继续降低税率，随着税制的优化，最终向1档税率靠近。增值税免征额可以适当提高，在现有的小规模纳税人免征额基础上在提高5到10万元左右，以应对当前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

（2）继续推进企业所得税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可知，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会激励企业创新，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社会经济水平。由实证分析得知企业所得税减税政策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果显著，在中西部虽然实证结果不够显著，但是可以看出企业税得税负对其经济增长是反方向关系，总之企业所得税能够从供给侧发力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前我国对小微企业和具有创新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与了较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当前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经济下行压力大和新冠疫情依然存在，小微企业的发展更需要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所以要进一步大企业所得税普惠性，制定力度更大的减税政策。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目

标,企业税的谁改革也要给与高新技术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可以扩大研发加计扣除费用,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在提高加计扣除比例,直至完全扣除,适当增加可抵扣项目。

(3) 继续完善新的个税制度,减轻个人赋税

由理论分析知,在2018年之后,个人所得税减税政策对降低个人税所得税税负效果才大幅度显现,在2018年之前,个税改革降低个人税所得税税负不明显,而实证结果显示,个人税所得税减税政策对我国东中西部经济的增长效果都不显著,所以,总的来说个税改革在2018年之前力度较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微弱,而这恰恰说明大规模减税政策中新的个税改革找到了关键点,开辟了税收改革新道路,其最大亮点是新增加了专项附加扣除,为未来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指明了方向,这对我国继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意义重大。所以,在未来个税改革中,要以现在新个税法为基础,继续完善个税制度。第一,个税免征额可以适当提高,当前高收入人群越来越多,提高免征额体现了收入分配公平,个税征收方式尽快全部实行综合征收。第二,适当增加专项扣除费用,当前生育成本较高,国家又鼓励二胎生育,可以适当增加专项扣除费用。第三,个税的征收因该考虑,地区差异,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其收入、消费、物价水平也不同,未来个税改革应考虑区域间的差异问题。

(4) 完善费收改革,保障降低企业负担的持续性

我国近年来的对收费项目改革力度较大,取消和停征了很多项目,改革效果初步显现,由上文的分析可知社保费、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后其收费增速明显下降,而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非税收入负担的降低对促进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所以,我国应该继续推行降费政策,完善收费制度。首先,对行政事业性收费清理工作强度要加大,防止不合理的收费范围和乱收费现象,并逐步加强监管力度,继续降低社保费率,减免企业的缴费比例,对于其他非税收入,要进一步清理不合理增加企业成本的收费项目,非税收入项目的设立要确保其合理性,否则,会增加企业的开支,不利于持续为企业减负。其次,随着税收法定推进,对于收费项目也要加快立法进程,因为收费项目较多,而且随着减税降费的推进,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压力加大,一些部门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在征费过程中会存在乱收费现象,这与我国要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相违背,所以,应该坚

定费收法制化，收费项目的制定、执行、使用要做到公开透明，接受群众监督。

6.2.2 针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实施差异化的税收政策

从以上分析结果可知，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不论从 GDP 总量、投资和消费总量，还是税收收入总量和税负承受能力都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比中西部经济水平更发达，除了地理因素外，更多的是雄厚的资本、充足的人力资源，完善的基础设施，所以，我国政府在面对这种经济状况，要善于利用财税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水平差距，这符合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首先，对于欠发达地区，给与更多的减税政策。从以上实证分析来看，同样的减税降费政策，在东部地区实施时效果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却不显著或者显著程度很低，针对这种情况要给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大的税收优惠力度，比如，可给与阶段性的直接优惠政策，直接免去一定时间内的应纳税额，也增加阶段性的减税政策，在原来税收的基础上扩大投资抵免、加计扣除范围等。这能够有效降低中西部的宏观税负水平，进而吸引外部资源投向欠发达地区。

其次，根据产业结构目标，给与欠发达地区相应的扶持政策。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相对落后，有本文第四部分的分析可知，第三产业占比最高的是东部地区。而我国当前目标是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以，进一步对中西部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实施针对性的减税政策。对于中西部基础产业也要给与相应的财政扶持政策，这样有利于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涌入。

6.2.3 减税降费与财政收支要提质增效，保障政策的持续性

减税降费政策已经实施多年，减税规模每年都连续增加，去年一年内减税规模超过 2.6 万亿元，若追溯到 2016 年全面营改增开始，这 5 年内减税降费规模总计可达 7.6 万亿之多，如此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随着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也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减少，财政支出压力变大，特别是 2020 年，为减轻疫情冲击，我国新增了针对性的减税政策，财政运行压力进一步加大，所以，近期一些学者提出的“财政收支紧平衡”的观点引

起了人民的热切关注。

由上文的实证回归结果可知，财政支出对促进经济的增长具有显著作用，所以在当前财政收支压力大的情况下，财政支出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这就要求财政支出工作得提质增效。首先，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可适当提高财政支出，对其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给与支持，这能够促进当地的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区域差异。其次，政府部门要发扬节约风格，坚持绿色高效办公，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支出费用，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减税降费工作也要提质增效，首先，未来减税降费政策实施要维护好往年工作的成果，因为当前疫情并未完全消除，经济环境存在不稳定性，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其次，减税降费要更加精准，对以前工作要回顾总结，然后找到改革关键点，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减税新政策。其次，要简化办税流程，确保政策落实。因为只有降低减税降费实施门槛，才能确保政策的有效落实，这样就能提高征管效率，有利于税款流入征税部门，进而能够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减税降费政策的导向作用。

综上所述，减税降费与财政收支要相互配合，提高工作精准度，这有利于减税降费政策平稳的运行下去。

6.2.4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培养地方税源，缓解财政收入压力

发展就是经济的成功转型，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⑩。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贸易争端使得国际贸易受损，这样的经济情形下，我国又大力推经减税降费，这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带来了巨大压力，尤其像中西部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会缩减，财政收入减少会削弱财政支出效率，进而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所以，要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培育地方税源，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缓解财政收支压力。首先，各个地区要明确自己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定位，精确挖掘本地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针对自己地区的产业特点，合理规划产业结构，促进其经济结构的合理转型。其次，对于重点税源企业和主要税收行业要加强财源监管和税费征管，对于当期企业应缴纳的税款，税务部门要做到应征尽征，避免偷税漏税发生。最后，构建地方主体税

^⑩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2017。

种，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保证地方政府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增长机制。

参考文献

- [1] Whalley J., A General Equilibrium Assessment of the 1973 United Kingdom Tax Reform[M].Economics,New Series.1975,Vol.42,No.166,p139-161
- [2] Piggot Whalley: New Development in Applied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 Myles,G.D.Tax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 Fiscal Studies,2000,vol.21, no.1:141-168.
- [4] Pedro jetta, S, Chatagny, F and Soguel, NC. 2009. Empirical Analysis of Tax Revenue Forecasting in the Swiss Cantons [C].The 67th International Atlantic Economic Conference,meeting paper.
- [5] Adkisson , R.V.,and M.Mohammed. Tax Structure and State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J].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2014,51(1):79-89.
- [6] Best,M.C.,A.Brockmeyer,H.J.Kleven,J.Spinnewijn,and M.Waseem.Production versus RevenueEfficiency with Limited Tax Capacity: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Pakista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5,123(6):1311-1355.
- [7] Keith Marsden. Links Between Taxes and Economic Growth,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J].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s, 1983(605).
- [8] R. Alison Felix. Passing the Burden: Corporate Tax Incidence in Open Economies [J]. Regional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7(468).
- [9] Herwing Immervoll, Henrik Jacobsen Kleven, Claus Thustrup Kreiner, Nicolaj Verdelin. Optimal Tax and Transfer Programs for Couples with Extensive Labor Supply Response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5(2011)1485-1500.
- [10] Anna Danielova, Sudipto Sarkar. The Effect of Leverage on The Tax-cut Versus Investment-subsidy Argument. [J].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011) 123-129.
- [11] Tammy Leonard,Xi Yang,Lei Zhang,Connor Reed. Impact of Property Tax Abatement on Employment Growth[J].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2020, 34(2).
- [12] 万莹, 陈恒. 2019 年我国增值税减税改革的政策效应——基于 CGE 模型的分

- 析[J]. 当代财经, 2020(04):27-37
- [13]姚维保, 申晨, 李淑一. 减税降费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吗? ——基于广东民营企业的数据实证[J]. 会计之友, 2020(07):120-125
- [14]曹玲玲, 印言. 减税降费能否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基于我国规模以上企业的实证研究[J]. 债券, 2019(11):30-34
- [15]刘磊, 张永强. 增值税减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J]. 财政研究, 2019(08):99-110
- [16]李明, 李德刚, 冯强. 中国减税的经济效应评估——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准自然试验”[J]. 经济研究, 2018, 53(07):121-135
- [17]李戎, 张凯强, 吕冰洋. 减税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J]. 经济评论, 2018(04):3-17
- [18]冯彦杰, 娄峰. 中国增值税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18(04):30-39
- [19]蒲火元, 曹宗平. 生产部门的减税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DSGE模型的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 2018, 32(03):89-95
- [20]姚春芸, 钟萍. 税制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6(10):170-172
- [21]赵延芳. 结构性减税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D]. 西北师范大学, 2013
- [22]孙彦彦, 韩仁月. 结构性减税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2(12):75-76
- [23]刘崴, 高广智. 税收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构性减税的经济效应研究[J]. 人文杂志, 2012(03):69-74
- [24]岳树民, 刘方. 新形势下的结构性减税与税制改革[J]. 税务研究, 2011(01):28-32
- [25]司规. 结构性减税:回顾与展望[J]. 中国税务, 2010(02):4-6
- [26]甘肃省国家税务局课题组, 杨继元, 李雪松, 刘虎, 任伟, 梁文波. 结构性减税对甘肃省经济税收的影响[J]. 税务研究, 2009(11):74-77
- [27]谢安忆.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逆向选择效应[J]. 经济师, 2008(06):68-69
- [28]安体富, 王海勇. 结构性减税:宏观经济约束下的税收政策选择[J]. 涉外税

- 务, 2004(11):7-12
- [29]汪川,姚秋歌.后危机时代中国减税政策的宏观影响和政策效应评估——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21(02):96-104.
- [30]张佐敏,马艺文.结构性减税的普惠性效应研究——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J].华东经济管理:2021(03):1-9
- [31]胡海生,王克强,刘红梅.增值税税率降低和加计抵减政策的经济效应评估——基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J].财经研究,2021,47(01):4-17
- [32]李雪松,刘明.降低增值税税率的宏观经济效应评估——基于中国CGE模型的情景模拟[J].财经问题研究,2020(02):72-80
- [33]宋永华,薛宇择.财税制度、差异化减税与区域经济发展[J].金融与经济,2021(02):63-71
- [34]闫怡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9
- [35]梁俊娇,李羨於,刘亚敏.我国区域税收负担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06):22-29
- [36]刘学亮.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分析[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06):134-135
- [37]张郁芳.结构性减税对四川省GDP增长的效应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5
- [38]张胜民.我国税收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兼论税收结构变动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J].财贸经济,2013(09):16-27
- [39]胡广运.我国税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09
- [40]史桂芬.地区税负“倒挂”与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J].经济纵横,2007(11):32-35
- [41]张伦俊.区域经济发展与税收贡献的比较分析[J].财贸经济,2006(02):69-73
- [42]董化杰.我国减税降费政策效应分析[J].中国金融,2020(05):21-24
- [43]广西财政厅课题组.减税降费视角下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研究——以广西为例[J].经济研究参考,2020(04):59-72
- [44]向丹.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必要性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0(04):176

—177

- [45]何帆,杨野,秦愿.国际减税的比较、成效与启示——基于发达国家减税方案的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20(06):1-14
- [46]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课题组,李万甫.聚焦:2019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J].中国税务,2020(02):28-31
- [47]李晓乐.企业减税降费、经济增长与财政优化——基于日本都道府县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测算[J].地方财政研究,2020(01):101-112
- [48]厦门大学CQMM课题组,林致远,王燕武,龚敏.中国减税降费政策的效力研究[J].东南学术,2020(01):144-155
- [49]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国库处课题组,樊勇.减税降费政策效果分析——以江西省为例[J].金融与经济,2019(12):95-98
- [50]马晓玲.减税降费背景下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研究——基于河北省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9(28):95-96
- [51]张岩.结构性减税与扩张政府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40(09):20-38
- [52]刘磊,张永强.增值税减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J].财政研究,2019(08):99-110
- [53]杨白冰,王溪薇.我国宏观税负合理水平及区域差异问题研究[J].中国物价,2019(07):26-29
- [54]张斌.减税降费的理论维度、政策框架与现实选择[J].财政研究,2019(05):7-16
- [55]刘尚希.稳预期的减税降费助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J].清华金融评论,2019(04):21-23
- [56]刘尚希.减税目的是有效引导经济预期[J].中国中小企业,2019(04):15
- [57]张学诞,梁季,许文,陈龙,施文泼,刘昶.近年来我国减税降费政策效果评估[J].地方财政研究,2019(03):11-17
- [58]乔婧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究[J].金融经济,2019(02):34-36
- [59]邓磊,杨颂成,王美玲.当前我国促进经济增长的减税政策选择——基于动态

- 模型平均的实证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8(12):47-50
- [60] 崔军, 李晓凡. 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是提振宏观经济的一剂良方[J]. 中国财政, 2018(21):30-33
- [61] 马千惠, 宫敏丽, 夏良康.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青岛市为例[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8, 29(18):140-141
- [62] 姜敏. 减税政策效应分析及完善[J]. 税务研究, 2018(06):109-112
- [63] 李鹏. 营改增对区域税收及经济的影响研究[J]. 企业改革与管理, 2018(06):213-214
- [64] 廖晓莉, 罗洁, 刘忠梅. 税收促进区域经济(新区)发展的国际借鉴研究[J]. 农家参谋, 2018(03):224-227
- [65] 徒芳草. 新常态下税收安排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政策优化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8, 29(02):169-170
- [66] 房林, 赵倩, 邹卫星. 要素税负和地区分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7(19):147-151
- [67] 原云霄, 王宝海. 小口径宏观税负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 财政科学, 2017(09):126-134
- [68] 杨灿明. 减税降费:成效、问题与路径选择[J]. 财贸经济, 2017, 38(09):5-17
- [69] 夏寅槐. 用“放水养鱼”灵活减税政策激励实体经济投资动能[J]. 杭州(周刊), 2017(11):36-37
- [70] 王鲁宁, 彭骥鸣. “供给侧改革”中的税收经济效应及税制优化[J]. 税务与经济, 2016(06):70-75
- [71] 李秋霞. 西方经济学中的减税理论及其借鉴意义[J]. 经贸实践, 2016(15):67-68
- [72] 韩亚奇. “营改增”对区域经济及税收的影响[J]. 中国税务, 2014(03):74-75
- [73]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 2017
- [74] 陈共. 《财政学》第七版[M].

后记

我历时将近三个月时间终于完成了我的这篇硕士毕业论文,在这段充满奋斗的历程中,带给我的研究生生涯无限的激情和收获。虽然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和阻碍,但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度过了难关。在此,我向指导和帮助过我的老师们和同学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蒋俊生教授。我的论文是在蒋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从论文选题、到初稿完成,给了我很多建议和方法,蒋老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学识渊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次,感谢我的同学们,非常珍惜与你们一起在信工楼 216 自习室学习的时间,能够与你们相聚一堂,共同学习,非常荣幸。

最后,感谢评阅论文的老师们在百忙之中给予我宝贵的意见,我在此表达诚挚的感谢。